

八

**建立各类学校
为巩固伪政权服务**

抗日战争图书馆藏书
www.krzzjn.com

伪满开原实验小学

王 夏

开原实验小学的前身

开原实验小学，从前人们叫它日本公学堂。过去日本帝国主义，曾经于其所占据的满铁沿线各城市的附属地内设立了许多中小学堂，开原日本公学堂，就是其中一个。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成立了傀儡政府，在伪政府的统一规划下，便把这个学堂改为开原实验小学。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这个小学之初，本是做过长远打算的，所以校舍的建筑既坚实耐久，又堂皇壮丽。校址在花园的东南隅，所以又称为花园小学。该处地势宽敞，环境清幽，而且学校的设备完善。只就体育设备一项来说，排、网、足、篮、单杠、双杠、肋木、滑梯、秋千、平均台、轩轸板等设施，无不应有尽有。

尽管校舍和设备如此完美。但是一般人都不愿意送子女入学，原因是认为学日语没有用。至于穷苦的人们，像这样的学校，他们不仅不愿意送孩子入学，根本也无力入这个小学，因为这个小学，要求入学的儿童必须是穿戴齐整，而且要干净利落的，穷孩子哪有这样的条件。在这里念到六年毕业，成绩好一些的，还可以考进满铁中学，或者给日本鬼子当个翻译；成绩差一点的，有些人是做了巡捕腿子，也有些人是做了洋买办。不管怎样，只要混点洋事，不仅有吃有喝，而且还能撑门面。

实验小学师资的选拔和教学情况

在公学堂的时期，教员大部分是日本人，中国人不过三四名。及改为实验小学之后，日籍教员逐渐调走，华籍教员越来越多。当1941年2月我到这校时，日籍只有校长冈村，首席福田。教员里只有一名女的，名叫武阿之。此外有个管庶务的名叫井口。这时华籍教员是11名。这11名教员比较起来看，应该是县内小学师资较高的。因为是实验小学，在人事上自然要侧重一些。因此伪教育科历年从师范毕业生里选拔一二名优秀的派来这校当教员，另外也从县内城乡各小学里选拔一二人。胜任的多留几年，不胜任的可以随时调走。调走以后绝大部分人做了校长。只要能到日本人山中大照（伪县视学）的家里去，借拜年叩节的因由，给小孩扔下个三十五十的，就可以派你做校长。要想挑一挑学校，那全看用钱多寡而定。如果拿个百八十元，就可以弄到高县较近的、条件较好的学校，但是一般人一时拿不出那么多的钱，就不能挑地点条件，只要能做校长对自己的颜面好一些，也就满足了。

在这个学校里，日语是压倒一切的学科，虽然“日语”课原则上都必须日籍教员担任，但到后来日籍教员少了，便不得不用华籍教员。但冈村很不放心，因为华籍教员不管他的日本话会得怎样熟练，如果要像日籍教员上课始终不说一句中国话，那是很困难的，因此冈村常去听华籍教员的日语授课，课后还要指挥一番，并且还让多听日籍教员的教课。日籍教员的授课主要靠手式、实物、画图等方式，越是说不好的话，越反复多次地重复，并不完全根据教材，目的在于实际会说、会写、会用。至于满语算术教得好坏，向来没人过问。

对日语的学习不仅限于课堂上，课外的日本话训练，抓得

也是非常紧的。为了让学生养成说日本话的习惯，便规定了学生每天来校和退校的一套日本话。比如，早晨来校时，见到教师说：“先生早安！”午间说“日安！”晚上说“晚安！”临走说“再见！”如遇有的学生因不习惯忘了说的时候，一旦被冈村发现，就要着实地训练一通。让那个学生从外面走进来，立正后说“先生早安”，叫回去时，先行个礼，再说“先生再见”。遇着一些学生说得不带劲，便三遍五遍、七八遍的出来进去反复地练习。旁观的人都感到心忙意乱，直到冈村说声“约西”（好的意思），才能停止。冈村说完便哈哈几声狞笑，学生认为这比挨打都难受。

教职员晨会，本是这校创始的。每天在朝会前10分钟召开。所谓开会，也是冈村把当日记在预定行事板上的话，再重复地向教员们说两遍。冈村不在校便是乔本说。至于其他的人只不过是出两个耳朵听一听。每天都是这样，长了连听也没人听了。你讲你的话，我想我的事儿。不过凡是乍到那个学校的教员都摸不着头脑。问别人又怕人不理，觉得这么几句话都没有听出来，还配到实验学校来。越是这样想的人，越好出漏子，闹成笑话，或严重点的就不免受冈村的责备。

教职员晨会一结束，马上就继续响起了学生朝会的铃声。教员赶紧出来站在本班学生常站的位子前边，以监视学生。午会也是如此。站好队后，首先向天皇陛下和皇帝陛下遥拜，然后做“建国”体操，做完操冈村照例进行10分钟左右的训话。因为没有人给翻译，有些教员和低年级学生是听不懂多少的，但是今天讲大日本帝国，明天还讲天皇陛下；今天讲日满亲善，明天还讲一德一心。类似这样的词语是人人皆知的，其他的话一揣摩也就懂了。但在讲话中有一样必须注意的事，那就是一听见冈村提到“陛下”的字样时，必须赶紧立正站着。为了引起

人们的注意，司令员要喊出“立正”的口令，随着口令动作会一致。有一次一个二年级小男生正当喊立正口令时，偶然笑了一声，当时被冈村听见，着实地打了两个耳光子。

每逢节日或假日，师生们不仅休息不着而且要比平时苦恼得多。比如3月1日伪满“建国节”，4月29日“日本天长节”，5月2日“回銮训民宣诏纪念”等节日，在前一天照例要进行半日训练。训练行进的队形、步伐、喊口号、敬礼等。口令、口号，一律用日语。半日的训练，中间连休息都没有，一运气就是3个钟头。级任教师喊得口干舌燥，同学们走得腰酸腿疼。

再有节日的服装。如果弄得脏了或坏的时候，一经查出来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样一来，有钱人家的子弟可以准备两套，没钱人家的孩子就不好办了。只好洗一洗，补一补。如果洗得不干净或补得补丁不对色，被冈村一发现便要逼问，弄得小学生哭哭啼啼，级任教师心惊胆战。因为说不定冈村什么时候发脾气，一发脾气，就要斥责学生，甚至打骂。

特别令人讨厌的是冈村的没头没脑的讲话，一讲起来就几个钟头。不是讲大日本帝国主义的如何强大，如何仗义，尽力地援助满洲国，就是讲天照大神是个怎样的救世主。为了让学生听懂他讲话的整个内容，这时总是要人给翻译的。当他讲到得意的时候，总是眉飞色舞地越讲越有劲，学生站得腰酸腿疼，越听越厌烦。不管你听得再腻，腿站得再酸，甚至头晕了，也不得不听下去。

总之，冈村的讲话，有两重用意，一重是宣传“王道”思想；一重代替了日语的讲课，因为别的学科都无所谓，日语是时刻要灌输的唯一的科目。

严格的军事训练

每周星期三午后的半日军事训练，这是县内其他小学所没有的一个特殊科目。这也是令人最头疼的一科，所以每到星期三午后，简直如同过关一样。号声一响，在3分钟内，三年级以上所有的队员（即学生）必须迅速地跑到指定的阵地赶紧排得整整齐齐。哪一队迟钝了一些，小队长（即级任）就要吃不消。如遇冈村不顺心时，轻者厉声呵叱，重则来个集体性罚站，因此没有敢违犯的。

军训开始时是层层报告。报告一律用日语。训练中更要绝对服从，如在前进中听到一声“卧倒”的口令，不论是壕沟、洼塘、或满是人畜粪便的地点，也得立即伏卧；前进中如果未下“立定”的口令时，即使是碰到墙也得越过去。所以在遇到墙壁较高的情形下，能爬过去的学生便爬了过去，爬不过去的也得手扒足登地做着爬过去的动作。不然的话便予以罚站罚跪、禁闭、打板等所谓的军事处分。

日籍教员对华籍教员的歧视

日籍女教员武阿之，人们叫她“搵袜子”，又叫她“武则天”。这是人们恨她，认为她很狡猾而且又很阴险妒嫉，因而叫开的。在她的心目中，华籍教员就是他们的奴才，只能听命，连提点建议的资格也没有。比如，有的级任提出学校应该研究一下怎样防止失盗现象。武马上放下脸子说：“校长的说话，别人的说话的没有！”意思是：你们中国人竟敢干涉学校的事，真不自量。

另外有个华籍女教员李国忠，为人聪明能干，很受学生的敬重，武因之深为嫉恨。有一次武的学生欺负李的学生，李凭

理解决两个学生的争端。武知之大为嗔怪，就凭一个中国的亡国奴才，竟敢这样地数落她班的学生，这真是胆大包天。因此便蛮横地对李说：“你的满洲人，乱七八糟说话的没有，我的学生，你的管不着……”此后人们总看见李的满眼含泪和武的气势汹汹。

实验小学的黑幕片断

趁火打劫

实验小学在每年招考新生的时候，正是学校里一些头头和平时受宠的一二名华籍教员有利可图的良机。历年来由于绅商竞送子女入这校念书的人多，而录取的名额有限，势必有些人的子女录取不上，这样就有一些人要设法托人。托人就势必托靠在校最受日本人宠信的所谓“红人”，才有可能办到。而这些红人也常想给冈村效劳，有这样的机会，怎能轻易放过，一来这不但为了效劳冈村取得更大的信任，二来个人也可以趁火打劫，闹得个肥吃肥喝。因为凡是经过他们给办入学的，没有一个不花钱或送礼物的，花钱多是10元、20元（20元是当时小学教员乍出任的月薪），拿礼物的更较优厚：成袋的上等面粉，还要配上鲜鲤、罐头、蜜桔、好烟卷等。如，据我所熟知的两个华籍教员，一个叫石光复，一个叫王兆义的，因在校时间较长，日本话说得很流利，所以很受冈村的宠信。至于他俩受贿多少，又给了冈村和其他日本人多少，这是无从查考的，但是送礼物的人是不少的，这种情况也是当时人所共知的。

混水摸鱼

实验小学历年都要给学生统一订做学生服。年年的制服都做得瘦而短。有的体格瘦点的或个子矮一点的学生，穿上还可以看得过去，至于身体粗壮的，个子高的，同样号的制服，一

穿到身上又瘦又短。这样一到发制服的时候，就会有些学生来找级任。有的说，上衣太瘦，有的说裤子太短。事实上并不是学生捣乱，实在是衣服做得太不像话了。有的袖子短有一手，裤腿短二三寸，还有的裤子瘦得包在屁股上。学生嗷嗷级任，级任只好百般劝解。至于怎么会做得又瘦又短呢？大家是心照不宣的。如果是成衣局有落项，那么管庶务的日本人井口怎肯答应，冈村也不能答应，事情不是很明显吗？那么结果怎么办呢？吃亏的还是学生，只好拿回家去，弄点同样颜色的布，瘦的帮一帮，花的是好钱，换来的是不合体的、拼补帮衬的衣服。

日伪统治下的绥化“国高”

曹佩新

学校概况

我于1940年1月至1945年“八·一五”时，曾在绥化“国高”任教。

这所学校的全称是：北安省立绥化国民高等学校。简称绥化“国高”。校址在现在的消防队驻地，原伪县公署对过，是由民国时期的黑龙江省第二中学改名建立的。在民国时期黑龙江省有两所重点中学，第一中学在齐齐哈尔，第二中学在绥化。日本侵占东北以后，把第二中学先改称为：滨江省绥化中学，后来又改为北安省立绥化国民高等学校。伪满时期的学制是：国民小学四年，国民优级二年，国民高等四年，也就是说，念完国民优级才能考“国高”。

1940年秋，在南门外西边的“穷棒岗”屯（现在的太平岗机床厂所在地）新建了校舍，学校迁至该地。此处占地面积很大，但是设备简陋，属于学校的土地有300余亩，有教室12间，还有校长室、教官室、事务室、值班室、厨房、餐厅等。另有学生宿舍10间，日本教员家属宿舍10间，农具室一栋，农夫室1间，猪、羊舍10间，还有一个简单的气象园。

学校类型是农业国高，学制4年。我来时，一二三年级各两个班，四年级一个班，共有学生350名。这些学生半数是从绥化城内的，其余来自五常、呼兰、郭尔罗斯前后旗、巴彦、望奎、庆安、铁力、绥棱、海伦、克山、北安等地，多数是比较富有的家庭的子弟，本县内的学生有少数是机关职员、工人、农民、小商人的子弟。

从1941年起，增加了朝鲜族班。班级按忠、孝、仁、义……的顺序排，新增加的朝鲜族班是一年级的仁班，后来把班改为组，至1944年，全校增至12个组（班），每个年级都是3个组，即忠组、孝组、仁组。

学校的领导机构

1940年我来校任教时，校长赵廷珍，首席教员是日本人山崎。1941年校长是曲振华，副校长是日本人未次。不久，未次调走，又调来个叫饭田的日本人任副校长。教务主任是日本人矢岛，事务主任是日本人今村。1942年曲校长调走，由饭田任校长。1943年，校长是日本人三好左门。1944年至光复，校长是日本人深城真义。中国人当校长，都配备日本人当副校长，日本人当正校长后，就不再设副校长。1942年前，表面上是中国人当校长，但实权在日本人的副校长手里。1943年以后则从名义到实质完全由日本人操纵。

招生情况

这所学校每年只招收100名学生,分两个组(即两个班),还招收一个朝鲜族班,也就是仁班。因为伪满时期“国高”非常少,又无别的学校,所以附近十几个县的近千名考生都力争考取这所学校。由于招收数量少,招生制度不严,营私舞弊现象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校长干脆明确规定,每个教师可以推荐一名学生,不论成绩如何均录取。这样一来更降低了质量。

除了按名额招收的学生之外,还有一部分学生是后援会(后援会是学校外一个组织,由当地士绅组成)成员的子弟,学校通过后援会可以向社会索取点供学校使用的物资,他们以胶车、马匹支援学校种地,因此他们的子弟入学不受分数限制,但不占录取名额。

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方法和设备

日本对“国高”学生的奴化教育是逐步深化的,表现在课程设置和教材上是逐步渗透、逐步向深广发展。

(一) 课程设置

开设的课程有:国语、国民道德、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农业、英语(1942年以后列为敌性语言而取消)、音乐、图画、体育、军训。

(二) 教学内容

1. 国语。所谓的国语包括日语和满语(汉语)。日伪把东北人民称“满洲人”,规定日语和汉语为“满洲国”的国语。

日语每周6节,在各门课程中占授课时数之首。把日语列为国语是殖民地化的一个典型标志。担任日语课的教师均为日本人,他们不懂汉语,凡是讲课、提问、考试等均用日语,目的

是迫使学生学日语。

满语课每周3节，以前叫国文，后改叫国语。主要内容是文言文和白话文。白话文占多数，大多数是无名作者的文章，日本作者宣扬日本历代天皇、将相武士以及法西斯军人的传记、故事，如乃木大将、佐久间大佐事略等。还有曾国藩的文章。此外，也有少许鲁迅、朱自清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是挖空心思选的，或断章取义，或在讲授时曲解原意，灌输英雄造时势和做统治阶级驯服工具的思想。

2. 国民道德。国民道德课后来改为“建国精神”，是奴化教育的主要课程，其宗旨是麻痹学生的思想，泯灭民族意识，使之成为日本侵略者的驯服工具，内容有：

(1) 宣传日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大和民族是优秀的民族，日本的“天照大神”是“世界之父”，宣扬“惟神之道”、“八紘一字”。

(2) 宣扬学生要做“满洲国”驯服的“中坚国民（国兵、警察、伪官吏）”，守“学生之本分”。

(3) 美化日本侵略中国的“我国之建国”，其中讲在“友邦之援助”下建立了“王道乐土”，中国人应“报恩感谢”。

(4) 宣扬日满同文同种应相亲，对日本侵略者应“一心一德”、“共存共荣”、“民族协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5) 美化傀儡政权的“皇帝即位”、“天壤无穷的国体”、“忠君报国”。

(6) 宣扬“大东亚圣战完遂”、“大东亚圣战必然胜利”。

3. 数学、物理、化学。教材内容较浅，又没有良好的实验设备和药品，教师讲课基本上是照本宣科，只有认真传授知识的老师，教学很认真，例如刘忠贤老师，没有实验器材就用手势演示，边比划边讲，颇受学生的欢迎。

4. 农业。农业课分为农业、林业、畜产等内容，教材很不先进、不系统，原始的内容多，如《农业泛论》讲的全是过时的耕作方法和耕作制度。虽然属于农业国高，讲的农业并不先进。

农业课本原来是汉文的，后来改为课本的每一页的上半部分是汉文（当时称满文），下半部分是日文。到光复前，课本一律改为日文的。有个叫福田的日本教员，教三年级作物课，他不懂汉语，上课时就让学生把汉文先翻译成日文，学生故意给他难堪，他把全班的学生挨个叫起来，都说不会翻，福田毫无办法。因为我是这个班的班主任，他就找我，让我和学生讲，就说他的业务水平并不低，就是汉语不如学生，希望学生帮他翻译。我无奈，就找于观海、王秉禄两个学生帮他把绪论翻译过来了。这位福田就把这篇绪论翻来覆去讲了一个学期。

5. 军训。从1941年起，开设军训课，由伪满现役军人担任教官，一般是尉官或校官，多数是即将被淘汰的军人，另外配备助手一名。军训课的目的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培养盲目服从的顺民，并准备补充兵员，为其充当炮灰。开始每周两节，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军训时数逐步增多，有时连续搞一个多月。军训课的内容完全和日本军队的训练科目一样，采取法西斯的训练方法，教官对学生要求非常严苛，最典型的是姚荣泰（陆军上尉），他完全继承了法西斯军人那一套。为了向上爬，对军训非常卖命，是忠实的走狗。每逢他上军训课都要由组长（即班长）用日本话喊“向教官先生敬礼”的口令。学生不会喊或喊错了都要挨打。每当他上课都拎个板子，手指着板子训话：“看见了没有；我就用这板子要成绩！”喊了立正之后，就到学生身后踢小腿，如果踢弯了，就说没用力站，随手就用板子打。有时到学生面前伸手要枪，学生不知怎么回事，就把枪交给了他，

这时又要挨打，理由是，武器不论什么时候都不能交给别人。这些事都不是先讲，而是打完了再讲。他上课，有时全班同学都挨打。

1941年秋，上面要来检阅。为了应付这次检阅，全校停课一个多月，体育教师也协助训练，除了队列训练之外，还有匍匐前进，利用地形地物进行战术训练，还搞野外军事演习，和日本侵略军的正规部队一样。搞野外军事演习时，姚荣泰因身体太胖走不动，就骑马指挥。自1942年以后，这种军训年年有，每年一至两个月。姚任军训教官期间，有三次上级官员到校检阅。第一次是第三军管区司令王之佑（中将军衔）来检阅，对姚的训练颇为满意，还题了“学贵有恒”四个字，挂在校长室里。第二次是第八军管区司令吕恒（中将军衔），第三次是伪北安省长李叔平。经过这几次检阅，他们认为姚确实和其他中国教官不同，是个实行法西斯统治的人才，得到了主子的赏识，将他调回部队，由上尉晋升为少校。

6. 历史。历史课程主要讲“满洲史”和日本史。所谓“满洲史”，是他们胡编的，将女真族历史单列出来，目的是不让青年学生懂得中国历史。日本史也是夸大其词，渲染吹嘘日本大和民族如何优秀。说“满洲国”是在“天照大神”的神光保护下建立的，是日本的一部分，根本不让学生知道中国的历史。

7. 地理。主要讲“满洲国”的，就是东北三省的地理，并细讲日本国的地理。把日本分若干个区域详细讲，目的是宣扬日本是世界上强大的国家。

8. 农业实习。这是“务实教育”的主要内容。名曰农业实习，实际是变相劳动。学校有农田20余垧，从种到收全是学生劳动。劳动工具是原始的，不讲农业技术，只是干活。

农田劳动由日本教官加藤负责，他说什么时间用人，教务

处就随时调动学生，有时上了半堂课也要停课，这类劳动一年2至3个月，缩短了授课时间，各科连一少半课也讲不完，星期日安排劳动不休息，所以，加藤有句口头语，把一个星期的日月火水木金土说成是“月月火水木金金”，没有“土”和“日”，即没有星期六（土）的半日休息和星期天（日）的休息。

（三）教学方法

学校在教学上不做具体要求，所以不少教师也就不讲究教学方法，教材也是七拼八凑，很不系统，凡是外国的人名、地名、国名、化学元素名称以及各种术语均用日语的“假名”来代替，还有些不伦不类的“协和语”。有些课本一半汉文，一半日文，至光复前，除了“满语”课本外，全改为日文了。

（四）教学设备

这个学校的前身是黑龙江省第二中学，当时设备很全，有较齐备的理化实验器材，藏书几万册，是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万有文库》的重点装备户，按期发来书刊。“九·一八”事变后，学校成了日本兵营，大批书籍垫了马圈，实验仪器遭到破坏，改为“国高”时，教学设备已所剩无几了。

勤劳奉仕

所谓“勤劳奉仕”是为日本侵略者进行义务劳动。从1942年起，“勤劳奉仕”成为教学内容的一部分。其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临时性任务，如：修飞机场的“格纳库”（飞机堡），修日本守备队的弹药库；给兴农合作社、农科所、日本私人农场筛小麦，选种、割玉米、起土豆、起牛蒡（日本人爱吃的蔬菜）等。另一种是集中时间修筑工程。如1943年春天给四方台烟草株式会社挖水田修大坝，学生赤脚站在冰碴上挖土，修两个多月才完工（这座大坝即现在的四方台水田主干渠）。又如1944年修绥

望公路，住在野外，搭个临时窝棚，夜间狼嚎蚊子咬，狼有时竟冲进窝棚吃学生的剩饭。野外施工吃不到盐，有时也吃不上饭，加之潮湿，很多学生患了皮肤病、胃病。由于日本人把学生当成苦力，激起中国教师和学生的强烈不满，日本人来了就干点，走了就不干；还采取破坏工具的方法进行反抗，他们把两个土篮都装满满的土，使个寸劲一挑，扁担就断了，将铁锹使劲挖到土里，用力一别就折了，有时一天破坏工具无数。

课外的奴化教育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学生进行奴化教育，不仅在课堂上、课本里宣扬“天照大神”、“日满同神”、“日满亲邦”、“父子之邦”，而且贯穿在日常生活中。

1. 教师朝会

每天早晨上班后都要举行教师朝会，由教务主任主持，全体教师排成两行，按方向先面向日本东京的“天皇”的“皇宫”，再向伪新京——长春的“帝宫”及“建国神社”遥拜（致最高敬礼，弯腰九十度）。然后用日语齐读《国民训》，不会日语的就跟着像念咒语一样，叽哩喳喳的念下去，谁也听不清念些什么。中国教师把这种例行公事视为儿戏，根本不当成一回事，只不过应付罢了。

2. 学生朝会

教师举行朝会时，学生就要在操场上集合，教师朝会结束，一同参加全校的朝会，学生按年组排队，校长登台听完各班学生组长报告人数后，由体育教师喊口令，分别要面向“天皇的皇宫”和“帝宫”、“建国神社”遥拜，用日语背诵《国民训》，唱伪《国歌》，校长讲话，宣扬一番“大东亚圣战”的“战果”，然后排队进教室。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还要在朝会上祈祷三分钟的日本皇军必胜。其实，师生在祈祷什么，很难说了。

3. 周会

周会除了例行朝会的内容外，要由校长亲自宣读《回銮训民诏书》，灌输所谓的“日满亲善，一心一德”。

4. 诏书奉戴日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每月8日定为“诏书奉戴日”。这一天，全城各学校师生都要在东门外“神社”（地址在现在的制粉厂）集合，由县长或副县长宣读《时局诏书》。后来这个规定改在学校举行，校长必须穿“协和服”戴“协和礼帽”，佩绶带，带白手套，由穿戴与校长相同的教师双手过顶捧出《时局诏书》（这个差事由有资格的教师轮流执行），校长在台上向“诏书”致最高敬礼，接过开读，念完后致最高敬礼，再交给捧来诏书的人，送回校长室的“神龛”里，接着校长讲话，照例宣扬一番“日满亲善”、“大东亚圣战”等鬼话。

5. 崇拜“皇帝”和“天皇”

学校要求学生在言行中，必须崇拜日本天皇和伪满皇帝，赞扬“日满亲善”，会背《即位诏书》、《回銮训民诏书》、《国本奠定诏书》、《时局诏书》、《国民训》。

6. 祭神社

每年的春秋两季都要举行“祭神社”仪式，由日本和尚念咒语，超度战死的日本侵略者的亡灵等。

7. 利用所谓的“节日”灌输“日满亲善”思想

每年都举行“天长节”（日本天皇的生日）、“万寿节”（傀儡皇帝溥仪的生日）、“建国节”（伪满建国日）的庆祝仪式，也是读一通诏书，给学生灌输一番“五族协和”（满、汉、蒙、回、藏）、“王道乐土”、“大东亚圣战必胜”的思想。

8. 日语检定制度化

为了诱惑学生学日语，在校内进行日语考试，合格的分别定为“一、二、三等”翻译的资格（三等就可以进行一般会话）。用佩带臂章的方式作为等级的标志，一等三道杠，二等二道杠，三等一道杠。还强迫学生用日语读《国民训》、《回銮训民诏书》、唱“国歌”、“校歌”以及一些颂扬圣战的歌曲，如果不用日语就要遭到毒打。规定朝鲜族学生，只能说日语和“满语”，不许说本民族语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下令所有朝鲜族学生必须改为日本姓名，要和日本人一样服兵役，很多学生改名时痛哭流涕，为了不忘祖先，他们改名时采取了在原名上加字的方法，如张奉秀改成张本奉秀，金正道改成金本正道。

“阶级”绝对服从

“国高”极力推行“阶级”绝对服从的军国主义的法西斯教育。学生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教师，稍一不慎，就要受到惩罚，轻则责骂、重则挨打。在学生之间级别更为森严，高年级学生可以以任何借口打骂下级学生，不准下级学生反抗。年級的标志是别在领口上的“I、II、III、IV”代表四个年级，学生之间互相见面，只要从标志上看出自己是下级生，就必须主动敬礼。因为字型小，很难辨认，下级生一时马虎，未给上级生敬礼，就要挨打，这也是培养驯服工具的手段之一。

“国高”教师的等级和待遇

“国高”的校长和教师都要根据学历和考试成绩授予职称。分为教谕、教导、教辅几个级别，并有官阶。

校长：校长属于职务不是职称，但大多数是由有“教谕”职称的人担任，是“荐任官”的官阶，和伪县长平级（伪满文官

分为：委任官、高等官、荐任官、简任官、特任官五等。

教谕：凡是伪满正式师范大学本科毕业的从事教学，定为“教谕”职称。

教导：凡是伪满其他大学，师道学校（相当于师专）和不是师范系列的留日大学毕业生从事教育，定为“教导”。

教谕和教导都是“委任官”的官阶，教谕以上公出可坐软席车。

教辅：不是伪满的大学毕业生和没念过师范的，包括旧民国大学毕业的人，定为教辅，是“委任官试补”的官阶。

教师的工资：

中国的教师工资很低，教谕每月七八十元（伪币），教导、教辅六七十元（伪币），生活是非常困难的。

日本教员与中国教员工资相同，但是日本教员的津贴相当高，有出国津贴、家族津贴等。津贴的数量高出工资很多。另外他们在生活上还有特配。如烟、酒、糖、茶、大米、酱油等。价格也相当便宜，生活非常好。

中国教师与敌特的斗争

为了反抗侵略者的统治，使青少年学生从被奴役中觉醒，中国教师利用上课、谈话等方式，常向学生讲中华民族的历史，传播抗日战场上的新闻。教师的言行引起了警察特务的注意。有一次宪兵队以反满抗日的罪名把王绍业和许德珩老师抓走了。王绍业经亲友的多方奔走，总算活着出来了，身体受到了严重摧残。许德珩则一去未还。自此中国教师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刺激。很多教师提心吊胆地工作，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教师并没有放弃斗争，虽然没有组织，没有领导，但是大家觉得中国人民不能长期受他们的奴役，只要活一天，就给学生讲点中

国的事。为了慎重，在讲课时采取婉转的方式透露一些抗日内容。例如学生问老师“苏联是什么性质的国家？社会制度好不好？”老师就说：“什么国家不清楚，但苏联人民很拥护，工业也很发达……”这样暗示学生就明白了。有时老师把消息暗地传给可靠的学生，在课堂上则什么也不讲。

随着形势的变化，特务密探对学校的监视越来越严，有时他们在老师下班后带着手枪到学校翻箱倒柜地搜查。有个王老师曾对我说：“我每天早晨上班，都嘱咐家里，晚上不回来，就不要等我了。”意思是说被捕了。

宪兵队的特务为了严密地监视中国教师，把工友张桂林叫到宪兵队，让他给密探当“腿子”。那时我独身住在学校，下班后，他找我商量怎么办，他说：“我是中国人，不能昧良心。”他不愿意干，打算不去。我说：“你当也有好处，听到什么不利的消息可以早点告诉我们。”这样他当上了密探的“腿子”，从此每星期都去一次宪兵队，回来都详细地说些情况。有一次回来立即找我，他说：“宪兵队很注意老丁头（丁春海老师），你告诉他多加小心，下班后哪也别去，监视很严，夜间他家的前后有好几个宪补（中国人在宪兵队当走狗称宪补，永远补不上宪兵）站岗。”我立即告诉丁老师，他知道这个情况后谨慎起来了，宪补监视三个多月，没捞到什么就撤了。

宪兵队每次找张桂林都问校内的反满抗日情况。他都说没有，宪兵队在他身上捞不到什么油水，就把他撤了，又在学校附近的地主家找了一个“腿子”。张桂林告诉我说：这回把某某拉去当腿子，你们要小心点。

教师的状况

当时中国教师绝大部分是有民族气节、不甘当亡国奴的。他

们利用各种机会与敌人斗争，最典型的有王老师、张继哲、丁春海等人。他们在日本人面前不卑躬屈膝。例如王老师，当“诏书奉戴日”轮到他捧诏书时，他不是双手过顶举着，而是用胳膊夹着。由于他很有民族气节，教师和学生都很敬佩。日本人对他也敢轻易下手。他当着日本教师的面骂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头脑昏庸，尚可利用”，他上课时经常给学生讲中国的状况，明确地告诉学生：“我们是中国人，不叫满洲人。”那时我们有收音机的教师，还经常在夜间收听重庆的广播，把这些消息不断向学生传播，特别是光复那年王老师领一部分学生到克山“勤劳奉仕”时，他和一些学生说：“小日本快完蛋了，没几天蹦达头了。”

还有些老师悲观失望，他们多是老年教师。他们憎恨日本侵略者，但对中国的未来悲观，经常以打麻将、吸鸦片、酗酒来解闷气，他们还寻找适当方式向日本人发泄不满，比如酒后装醉打他们，嘲笑他们。

日本教师大多数经常打学生，在中国教师面前吹嘘他们的武士道精神。少数日本教师有厌战情绪，对日本军国主义政策不满。如田中教师在日本人面前不讲话，但对中国师生很亲近。日本侵略军连连失败，兵员不足，日本教师中的丙种在乡军人也成了强征对象，被强征入伍的感到末日来临，哭哭啼啼，“大和魂”精神一点也看不见了。

学生状况

学生中只有极少数相信日本帝国主义的那一套，绝大部分学生对日伪的奴化教育不满，不甘心当亡国奴。他们要求老师多讲关于中国的历史、地理和抗战消息。毕业后不愿替人卖命，看不起唬洋气的警察，骂他们是“警察狗”，毕业时日本侵略者

“鼓励”学生当警察，待遇比较高，可是去的人却很少。

伪国高的结束

1945年8月15日之前，连续降了40多天雨，8月15日这天突然放晴。这天早晨从“新京放送局”（广播电台）发出预告：“今天午间有重要新闻，请注意收听。”反复播了几遍。中国教师都纷纷议论，猜测是什么内容，午间人们都在家里收听广播。原来是日本天皇无条件投降的诏书。这个惊人的消息，一下子振奋了中国教师，久受压抑的心头吐出了塞满胸腔的闷气。下午上班时我们都喜气洋洋，扬眉吐气，说话的声音都比以前高了；日本教师则个个垂头丧气，有的眼睛都哭肿了。校长深城真义又把在校的学生召集到操场，讲了几句话，大意是：8年的中日战争，我们失败了，你们胜利了，战争从此结束了。讲完话一改往日的傲慢姿态，恭恭敬敬地给中国教师和学生行了一个礼，懊丧地走了。伪“绥化国民高等学校”，也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而结束。

（摘自《绥化文史资料》 韩玉江整理）

我所了解的伪满建国大学

刘第谦

伪建大的校址

伪满建国大学（以下简称建大），位于长春市斯大林大街（伪满新京大同大街）最南端的西侧，地名欢喜岭。建大坐西面

东（现为航校及工业学校校舍），北邻伪建国忠灵庙，西邻畜产兽医大学。两座石砌的敬台，构成了没有门的校门。进入校门绕过花坛不到百米是大礼堂，名曰“养正”，是集会与武道训练场所，规模较大。礼堂南北两侧各有一幢两层建筑，是图书馆和教室。礼堂西是大操场，与礼堂相对的是食堂和浴池，其两侧各有6栋半月形的平房，是前期一、二年级宿舍，三年级宿舍在西北侧，是两层建筑。其东邻为医务室与病院，东南为校本部，称“本馆”，是学校办公室和后期教室。后期宿舍、食堂在前期之南，相距500米左右，由两幢三楼组成。以上统称校部。校部连西，南是一片草原，北是丘陵沟岔。校园内有农田和各种训练场地，占地65万方坪（坪是日本计量单位，合36方尺），折算为3210亩。殖民者选择此地，理由有二：一、南湖之滨，景色宜人，幽雅寂静。二、邻近有伪建国忠灵庙。建大要求学生死后入庙享祀为“最大光荣”和“最高理想”。伪建大誓歌最后的一句话是：“建国忠灵庙，是我们的归宿。”以此鼓励学生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牺牲品。

伪建大的培养目标

1937年2月在伪满新京成立“建国大学创设准备委员会”，5月在东京形成为“建国大学创设委员会”，组成这个委员会的15名委员是：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伪满总督府的二把手）、总务厅长官星野直树（伪国务院的真正主宰者）、陆军参谋本部少将作战部长石原莞尔（核心人物）、陆军省军务局满洲班长片仓衷、关东军参谋部第四课部员辻政信（做具体工作）、协和会总务部长甘粕正彦及作田庄一、平泉澄、笕克彦、西晋一郎、张景惠、罗振玉、袁金铠、伪大同学院院长井上忠野、稻叶岩吉等所谓“各界名流”。

1937年7月15日——17日于新京军人会馆大礼堂召开大会，出席有东条、星野、作田庄一、平泉澄、笕克彦、稻叶岩吉、宇田一、辻权作、张基景惠、罗振玉、袁金铠等人，由东条任委员长，星野副之，会上通过了《建国大学创设要纲》、《建国大学令》、《第一期生选拔要领》、《教授聘请计划》及“建校三阶段”等有关规定，并议定学校名称为建国大学。接着修建校舍和招收学生，翌年5月2日正式开学。

伪建大的培养目标是：“造就深刻体会建国精神，彻底实现日满一德一心的骨干力量。”即要在建大培养出一大批桢干“栋梁之材”、“满洲国的国士”、“协和会的职员”。至于协和，殖民者解释说“以力合者谓之协；以义合者谓之和”，即“通力合作建设新国家”。建大《总则》里也说：（建大学生）“都是实现协和理念的同志。”因此，建大学生入学后必须参加协和会，毕业后约有五分之一左右的人分配到各级协和会。

伪建大的总长（校长）是伪国务总理张景惠兼，副总长是名誉教授作田庄一兼。张景惠在担任总长期间，是个尸位素餐的挂名校长。除掉每年8月的开学式上由他领诵特颁“诏书”和毕业式上伪帝来校时由他领班三呼万岁以及日皇裕仁的三个胞弟——秩父、三笠、高松宫，朝鲜废王李垕来校视察时，他伴同前导外，另外什么都不管。给学生做过几次训话，但三句话不离卖国求荣的老本行。比如，有一次精神训话，他讲了一阵令人作呕的建国精神后，貌似关怀青年的样子说：“官是有你们作的，可别闹事，过去（可能指三·一八惨案），北京学生闹事，不是都叫段总理搁机关枪给突突了吗？”接着又介绍自己叛国投敌当汉奸的经验说：“要多练手腕儿。”“要好好保养身板儿，这可是本钱啊！”“我老啦，靠我靠不住啦！副总长（尾高）那人倒是挺厚（忠厚）的，跟着他，没错儿。”“要听话！当长官的

最稀罕（喜欢）听话的，谁听话谁有出息！”

1941年大礼堂落成时，请他题横额，他题的“养正”二字，写得一大一小没有对称，当秘书把日本人写好的养正二字拿来让他摹拟，他说：“又让我挥毫啊！”因为他不懂这是句恭维话，一时传为笑柄。他自知愧儡，所以他对副总长作田说：“我不懂教学，一切拜托您多操心了……你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副总长作田庄一，是1905年东京帝大的毕业生，1908年应聘到我国武昌，任湖北法政学堂教习，以后又留学美、英、法三国。他任京都帝大助（副）教授时，讲授《统制经济》，同左派名教授河上肇针锋相对。因不受学生欢迎，长期不得提升。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之后，日本走向法西斯化，河上肇被捕入狱，作田否极泰来。1930年他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提升为教授，1931年擢为经济学部长（院长），1938年1月被提升为伪建大副总长。

作田主宰建大后，尽管他的政治立场是反动的，但他敢于提倡学术。从东京、京都两帝大请来了笈克彦等3名名誉教授，千叶、福岛等7名教授（都有博士学位），又从朝鲜请来名教授崔南善，从北京大学请来名教授苏益信、鲍明铃。由于崔南善参加过“三·一”独立运动，朝鲜总督南次郎提出过抗议，苏、鲍二教授参加过抗日爱国活动，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寺内寿一也提出异议，所有这些，作田先生都毫不动摇。一个时期建大的教授特别多。1943年我考入建大时，教授与副教授还有七八十位。师资队伍这样庞大，是和作田的雄心分不开的。有人说，作田要把伪建大办成一座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最低要赶上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最高是把建大办成一个开放的世界性大学。他打算请中国的胡适、印度的圣雄甘地、俄国被放逐的托洛茨基、美国的《大地、分家、儿子们》的作者巴里·巴克……来校讲

学。他对教授的讲学是尊重的，对学生的学习是重视的，虽然还谈不上学术自由。因此，在他掌政的四年半期间，这所造就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工具的伪建大成了名副其实的伪满洲国的最高学府。

关东军宪兵队对建大中国学生的爱国活动进行第一次镇压是从1941年末开始的。11月逮捕孙松龄，12月逮捕杨增志，1942年1月全面大逮捕，到4月才算基本结束，共捕学生18名（包括闻风逃跑2名）。最后以“反满抗日罪”判处无期徒刑者2人，绝大部分判处15年，最低刑期5年（注：日伪对伪建大进行过三次逮捕，第一次是在1941年11—1942年3月，先后捕去杨增志等16人，加之闻风逃到关内的2人，共18人；第二次在1943年开学不久，在一天上课时突然点了10个人的名字，接着捕去8人，未捕去的2人逃入关内；第三次在1945年5月，捕走乔百令等9人，未待判刑，因日本投降他们就出狱了）。

在大讲“民族协和”的最高学府里，反满抗日被捕的人数也最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讽刺。作田副总长同整务科长（后政部，管学生训育）青本副教授都因此而放声痛哭，承认办学失败。尽管如此，作田还是到监狱去看望在押同学，他一副惋惜的样子，说：“你们并非因道德败坏而犯罪，你们是为了自己的民族宁肯牺牲自己生命的人，是政治犯……我不但不责备你们，还希望你们能够挺起胸膛活下去。”当关东军因此事件诘责他本人时，他从容不迫地答道：“在民族协和没有真正实现之前，出现这种事件，是无足为怪的。”据说，作田曾要求关东军：把这批被捕学生交给他，由他负责进行再教育，而未被允许。最后作田不得不因这次事件于1942年6月16日引咎辞职。只保留了建大名誉教授职务，回到自己的故乡山口县。

离职后，他对建大还是念念不忘的。1943年他由故乡风尘

仆仆地来校讲学。题为《王道乐土的理想》，讲课时两眼望着前方，发音清楚，语调缓慢，谈到“民族协和”时，他说：“满洲建立帝国时（指1934年），学生也提灯庆祝，但在解散回家的路上，他们就把提灯踢坏踩扁，并且都哭了……可见体会王道乐土，民族协和之不易。”又说：“日满两国，名为两国实是一家，王道乐土、民族协和必将实现。”“但令人遗憾的事不断发生，民族协和并未实现，这是不可容忍的，希望你们……做出榜样，做出贡献。把王道乐土的理想变成现实。”

接替作田主幸建大的是日本国军事参议官陆军中将尾高龟藏。他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是战犯东条英机的上级生，是1938年7月，对苏挑衅的“张鼓峰事件”的指挥官。尾高在军界的资格很老，常常倚老卖老。1944年秋，东条来建大讲话时，我亲见东条先敬礼他才还礼，尾高登台致词时，虽然也吹捧东条一手创立建大，是什么“建大之父”，但对东条的称呼却是“东条君”，而不用敬称的“阁下”。这表明他就是在职位低于东条的情况下，照旧摆老资格。

尾高来校后，与前任显著不同，第一次讲话，他就发誓要把建大变成一个，“深刻体会建国精神，适应‘大东亚圣战’需要的一所新型大学。”也就是说“加强奴化教育及军事训练，为侵略战争效力卖命”是他的办学方针。正因如此，他把前任作田的重视学术改为重视军训和思想控制。从这以后伪建大的军事训练加强了，服从命令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就是校务会议上最后也要由“副总长阁下”（人们必须这样称呼他）来“统裁众意”，以“指挥官决心已定”的口吻一锤定音。他的德政是：先是军事教官打学生，继而有些教授、副教授也不止一次地打学生了。

尾高这套以治军的方式治校是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太平洋战

场上节节败退，垂死挣扎的形势的需要。说他把建大变成一座大兵营也不过分。1944年秋，他举行了校内阅兵，这一天，他骑着高头大马，由军事教官太田登执辔随行，宛如皇帝巡狩。在看完战斗演习登台讲话时，他挥舞右拳，大骂三浦少校（伪军配属武官）是完全失败的指挥。顿时全场愕然。

尾高是日本法西斯军人里的死硬派，1945年，建大的日系适龄学生全部被征入伍，中国学生从6月份也开始“勤劳奉仕”。前期一、二年级在校搞农业生产，三年级以上先去沈阳兵工厂（奉天造兵所），一个月后再到公主岭飞机工厂（满洲飞行株式会社中机械处）从事生产军火武器。8月8号，尾高到公主岭“慰问”，翌日清晨就碰上空袭，起初人们还以为美机B——29，半个小时后，当番（值勤）报告说：“苏联敌机30余架来袭。”尾高霍地站起来问：“没有弄错吗？”当番学生答：“确实，苏联对我宣战了。”这时尾高二目圆睁，呆视远天，下意识地猛拍一下大腿，失声地说道：“完蛋了。”下午，他奉电回新京参加关东军紧急会议，行前，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对大家作了个简短讲话，说什么：“这才是我们盼望已久的战争哩！……这才是真正的战争哩！……真有趣啊！……皇军必胜。”

“八·一五”前夕，伪满洲国的首都——长春市陷入一片混乱，日子最不好过的关东军一直担心和恐惧的厄运终成为现实，在关东军高干会议的一片哭声中，只有尾高一个人跳出来大喊：“我要带领建国大学学生抵抗，给我30万元经费，我去打游击。”结果是，钱款领到手后，第二天照数退回，声称：“我干不了！”

光复前夕，七、八期生的日系同学还剩70多名，学校以护校为名全体发给实弹武装起来，一为随时出战，二为监视中国学生。8月11日，尾高带领青本副教授与安倍教授等来校，召集全体学生在操场集合，武装的日本学生站在一边，徒手的其

他学生站在一边，尾高戎装登台，喊完“皇军必胜，苏军必败”的口号后说：“苏军已到白城子，日本学生全体参加游击战，‘满’、‘露’（俄）、鲜（朝）系中自愿参加者，跨出队列一步。”他连问几遍，只有（家靠近日本）济州岛的一名朝鲜族学生参加，余无应者。无奈，他只有宣布：“参加保卫战的发给军装、军器，其余的到公主岭参加勤劳奉仕。”接着他又到大同学院，要学生接受军事编制，准备在苏军占领区打游击，结果碰了钉子。8月15日上午，气急败坏的尾高全副武装，率领两卡车荷枪实弹的关东军来到大同学院，下令三期生到操场集合，把学生代表万兴治、宋立生等喊出队列，接着他抽出战刀威胁学生说：“胆敢拒绝打游击，把建大精神扔到哪里去了？”想不到学生代表并不理他这一套，沉着地申明不去打游击的理由。如果在平日，尾高早把战刀一挥顿时血肉横飞了，但这时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已成定局，行凶杀人当时就得不到好下场，于是也只有软下来。两个钟点后，日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投降后，尾高还以“打游击去”为名，拐走学校全部公款，包括90万元的教职员退职金。他换上中国老百姓的服装，携带妻子和3个女儿逃之夭夭，幻想有朝一日东山再起。

殖民者的怀柔政策

伪满学制是春季始业，各大学招生统在下半年进行。第一批招生在9月，由建大一校招收；第二批招生在10月，由军官学校一校招收；第三批在11月，由18个普通大学招收。报考建大的手续是：凡经国民高等学校校长推荐，学习总平均在90分以上，操行甲等，经官立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者方可报名。先经校方审查、平衡受理后再邮寄受验票（准考证）。考试分两次进行：第一次考试在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承德、安

(丹)东、锦州、吉林、牡丹江等地举行。对中国学生考：1、日语；2、常用语（本族语）；3、历史；4、地理；5、数学；6、作文（有的年度常用语与作文合并）。经笔试合格者发给往返路费，供应食宿到本校参加口试与身体复检，这是第二次考试。因为是用日语授的课，所以口试主要看日语程度。也有知识测问。我记得向我提出的问题是：“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你怎么看？”这题很刁钻，因为伪满提倡尊孔读经，目的在培养忠君与等级服从观念，而孟子却提出“君为轻”，所以考生必须对这个矛盾作出合于他们口味的分析和解释才行。体格检查在军医院进行，检查得细致而严格，最终合格者寄给入学通知书。由于每个考生对建大、军校与普通大学有三次应试机会，结果每期建大新生同时考中三校者几占半数，余者考中两校，只考中建大一校者，虽非绝无，也是仅有，够得上按殖民者需要的德、智、体标准择优录取了。当时很多中学生对建大是向往羡慕的，因为它待遇好，也因为它六年制，幻想可以学到一些东西。还有一个最现实的原因是：伪满的大学考试，特别建大、军校两校没有徇私舞弊和人情后门，这是尽人皆知的，加上它又是全公费，结果在这所“最高学府”里反倒是家境不佳者占相当大的比率。因为家境贫寒者自知求学不易，有些人又一心要改换门庭，因而焚膏继晷孜孜以求。在伪建大的总共500多名中国学生中，只有七期生谷学谦（东北师大副教授）是伪交通部大臣谷次亨的侄子、八期生袁樾林是伪尚书府大臣袁金铠的孙子。谷学谦本是高才生，袁樾林是投考两次才考中的。他入学后，同学们对他有议论，以为是照顾所谓的“建国元勋”子弟。为此，校当局曾郑重宣布：“袁樾林是成绩合格被录取的，不存在照顾之说。”殖民者之所以这样不徇私情，从严考取，主要是为了把学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全都拉拢过来，以便为自己造就一批有使用

价值的人。

选拔从严，有利于中国学生爱国集体的形成。如果改为推荐制，专门推荐亲日分子，情况就将大不相同了。

其次是待遇从优：新生入学报销旅费，入学后发给被、褥、毯子、呢子和布做的学生服、帽子（校内战斗帽、校外大沿帽，伪满各大学只有建大、军校戴大沿帽，其他各大学仿日式戴四角帽）、皮鞋一双，胶鞋、手套随时补充，此外还有饭盒、水壶、书包等，学习用品、伙食、医疗完全公费，每月还发给零用钱5元，称为津贴。毕业后送入专门训练伪官吏的训练所——大同学院受训3个月，结业后一律给以高等官试补任用及150元伪币。另外，开校之初，伪帝特颁“诏书”，日皇三御弟及废王李垠来校视察以及战犯东条的两次讲话，都被说成是高看一格的“政治待遇”。

建大学生毕业后要到大同学院受训一事，在1938年颁的《建国大学令》里并无此项规定，1943年建大第一期毕业那年，殖民者考虑到，伪大同学院与建大都是造就伪官吏的场所，不注意将会发生两个各立门户的文官系统。为此，3月15日，以“敕令”修改《建国大学令》，补充规定前期是二年半修了，后期照旧三年毕业，毕业后到大同学院受训三个月。6月，一期生毕业，接着到该学院受训，学习《建国论》、《满洲行政论》、《官吏道》等十几种课，结业后任伪官吏，从此成为定制。

在建大，确实是把假协和扩大到最大限度，用石原莞尔的话说：“一律平等是铁财”，但这是假的。说它假，是因为“协和”是钓饵，收买是目的，谁都知道，父母受压迫，而对自己表示“善意”这是狐狸设宴。说它假，假在假戏真演，以一件“小事”为例：中国学生为了请假回家，便由家中拍来电报：“父病危笃，速归。”千篇一律，都是类似理由，结果“危笃”的

父母亲一个也没死。任何人都能鉴别出来电报的理由是假，但负有控制与监视学生任务的塾头，几乎无例外的都给假，并在给假与消假时两次给以慰问、安抚。这种心照不宣的假戏，一直演了8年。

伪建大的建制

（一）行政机构

建大在伪满的统治机构中，是伪国务院直属的一级组织。它同大陆科学院、大同学院一样不隶属于文教部，而是与它平行。

校本部设总长一人，总揽校务；副总长一个，襄赞总长。名虽如此，实则不然，汉奸总长并无实权，而副总长名虽襄赞，实乃主宰。整个伪满都是这样，建大自不能例外。

总长以下的直属机构：

1. 校本部

（1）1938——1944年设6科1室

总务科 科长：高木一也；副：泷川淳。

教务科 科长：教授重松信弘；副：村教三。

军教科 科长：陆军大佐小松茂九万。

训务科 科长：教授富木谦治。

塾务科 科长：助教授青本敏彦。

图书科 科长：教授登张信一郎。

医务室 医官：军医大佐小原德太郎。

（2）1945年起为5部1官（改医务室为医官、并训务于塾务）。

总务部

庶务科长：江原节之助。

教务部 部长：教授千叶胤成。

基础科主任：千叶胤成。

教务科长：教授森下辰夫；副：斋藤毅、伊藤满。

文教科主任：教授四宫兼之。

政治科主任：教授村井藤十郎。

经济科主任：教授须永秀弥。

前期科主任：教授森信三。

塾务部 部长：教授村井藤十郎。

塾务科长：理事官吉川武德。

前期塾训育主任：教授安倍三郎。

后期塾训育主任：教授村井藤十郎。

军教部 代部长：陆军大佐铃木重义。

图书资料部 部长：嘱托中岛犹次郎。

图书科长：中岛犹次郎。

资料室主任：助教授大村道渊。

医官 军医大佐小原德太郎。

2. 参议会与评议会

参议会是备伪总理大臣（建大归伪总理大臣管辖）咨询机关。有权讨论与决定学校大政方针，委员由会长（总理大臣）任命；评议会备总长咨询，包括校内日常工作及有关教学重大措施。

3. 大学院

《条例》规定：“招收毕业生优秀者与其他大学人员中经认为合格者。从事建国精神和对专门学术之深入研究。”又规定：“无固定年限。”事实上大学院只有建制并未真正成立。其因有二：一是1943年是日帝走下坡路的一年，无意于发展教育事业；二是1943年6月第一期毕业时，副总长作田已离校一周年，他的班底也随之失势。军阀尾高无意也无力领导大学院。

4. 研究院

是作田经营的，尾高来校后扩大了研究队伍，安插一批他所认为合格的人为研究员。

《条例》规定：“以建大之教授、副教授为主，吸收大同学院、大陆科学院、师道高等学校、政府、协和会之主要成员构成。”“研究建国原理、国民思想、国家政策、必须学问之蕴奥，以及研究以精神团结为中心的治校方案，用以指导学生。”

研究院承担了《满洲建国十年史》（1932年——1942年）和《满洲百科全书》的编写任务。

学院组织机构、主持人名单如下：

院长：由副总长兼任，1942年尾高易作田。

基础研究部 部长：文学博士千叶胤成。

文教研究部 部长：文学博士福岛政雄。

法政研究部 部长：总务厅次长松木佚。

经济研究部 部长：院长兼任。1938年——1942年经济学博士作田庄一；1942——1945年陆军中将尾高龟藏。

综合研究部 部长：协和会中央本部总务部长官原达郎。

1941年有研究员66人，1942年激增至120人，其中，中国人不到10名。反映了不但在行政部门是日人的一统天下，研究部门也是一手垄断。

出刊了“期刊”、“研究报告”和一批“论文”。内容是反动政治方面多，专门学术方面少，并仅限于作田时期。

（二）学生

1. 学年编制

按《建国大学令》规定：前期授普通课，3年修了（1943年3月改为二年半）属于预科性质；后期授专业课，3年毕业，属

于本科，共6年。

2. 学生的民族比例

建大是多民族汇集的学校，各期（年级）都由汉、满、蒙、回、朝、日、俄7个民族构成，殖民者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硬把7个民族分成两个对立部分：

“满系”别称“大陆系”，包括汉、满、蒙、回、俄5族，统以伪满洲国的“满”字命名，而非满族。这是伪满的官方称呼，目的是让各族都承认自己不是中国人，而是“满洲国”人，俄国人也不例外。“满系”每年录取的人数不等，一期生55名（最少的一期），三期生64名，四期生77名，五期生84名（最多的一期），平均每年召70名左右，其中蒙、俄两族受照顾。录取时留有固定名额，不问分数高低必须录取10名左右，其比例概为蒙7俄3，我所在的六期则为蒙9俄4。

“日系”别称“海洋系”。以大和族为主，包括日帝直属殖民地朝鲜半岛和台湾省的汉人。日本殖民者的“理由”是：他们都是日本国籍，这样，硬把东北的汉族同台湾的汉族划分为两系，以及对东北出生的朝鲜族学生，不论其汉语程度如何高，日语程度如何低，也不许随“满系”入学。日系的招收人数：1938年为95名，1943年96名，1944年103名、1945年105名，年平均招收100名，如果加上新三期则超过110名，即使把台胞加入所谓的“满系”两系的比例还是日占五分之三，“满”占五分之一。

上面所提的“新三期”，是因为建大从四期起改为由国民高等四年毕业生考入，这样日系生就会多念两年，为了不吃这个“亏”，校当局在三期生下一年级中又招收一期日本学生，叫做新三期（后并入老三期），日本人还嫌不够，规定从四期开始，“满系”先入学一年，到二年级时，日系新生再插班入学。这样

做，客观上对中国学生的民族团结大有好处，全塾只有塾头与日系指导学生是日本人，私自开会都可以办到，迨第二年日系新生入学时，中国学生的集体业已形成，日系处于被动地位，很难收隔离、分化、控制之效。后来，殖民者察觉这是怕吃小亏（日系多念二年）却吃了大亏。于是赶忙改弦更张，重新规定：从八期起两系同时入学，但为时已晚。这样，建大的四——七期，都是中国学生先入学一年，只有新三期例外。大战后，回国的日本同学总是把新三期称为四期，四期以下顺延，出现了中国学生八期，日本学生九期的与实际不相符的情况。两国复交后，中国同学提出：建大共有八期而非九期，新三期已并入老三期并非独立的一期。直到1981年，日本学友才接受了中国学友的建议，废止了九期之说。

3. 在籍学生总数

建大在校生的总数，最有代表性的是1943年，因为在这以前年级不齐全，在这以后人数变化大，只有这一年六期俱全，延期征召的规定尚未废止，从而人数稳定。这一年一期生（后期三年）107名，二期129名，三期224名（旧制生144名、新三期80名），四期166名，五期187名，六期（前期一年，这一年没有日系）82名，总计在校学生895名。

1944年春，学生总数是929名，这是建大在校学生数的最高峰，足资参考。但到这年夏季，日系学生大批应征入伍，以致6月19日二期生毕业时，原有的129名学生，只毕业了53名，表明在这期间有70多名日本同学被“天皇陛下御召”去了。其他各期也大致如此，日本同学的人数大大下降，使中日学生的人数对比开始颠倒过来。

4. 毕业生总数

建大毕业了三期学生，大约210名，中国学生居多。

1943年6月12日一期生毕业。由于伪帝溥仪“御亲临”，折腾坏了全校师生，事前演习了一星期。届时路上布满军警，师生肃立以待，装模作样煞有介事，无非是殖民者为提高傀儡的形象与建大身价而进行的一次矫饰做作滑稽戏。9点20分，伪帝莅临。毕业典礼开始——伪帝庄严伫立，全体肃然致敬；接着由张景惠向106名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行礼如仪后到操场，进行了做建国体操、伪帝阅兵、全体学生通过主席台以分列式给伪帝看等一系列活动。一直闹到11时30分他才“启辟还宫”，典礼于斯完成。这天下午一时，日文版《满洲日日新闻》便以头版头条刊登建大毕业式消息及分列、毕业式照片，下午全校宴会。晚上举行庆祝晚会，毕业生由挂名校长在总理官邸设宴招待。

一期入学时共150人，毕业时为什么减少44名？除少数死亡、降级者外，主要是第一次大逮捕和逃奔祖国者一期生也占相当比重。日系学生还有20人左右当兵（因为首次废止延期征召，还采取自愿和挑选，所以波动面不太大）。到1944年6月19日53名二期生毕业时，日系毕业生只剩下一人，仪式也不像一期毕业那样隆重。原因是：1943年7月，由废止延期征召改为凡是大和族，不问体格好坏一律入伍。到1944年进一步规定，凡属日本国籍者一律当兵。连建大的副教授以下的日系教职员也不例外。因此二期毕业时，日本同学只剩下1人。对入伍的，一律发给毕业证，承认学历。

三期毕业的时间是1945年6月，那时德国早已投降，日本侵略者面临末日，毕业式草草举行。这期毕业可能是55人，日本同学只有北冈宪一郎1人。

这三期毕业生大约210名，日本学生占十分之一稍强。

5. 建大师生在籍总数

战后日本同学成立了“建国大学同窗会”，对建大八期学生及教职员的人数、生存者、死亡者、消息不明者作了调查统计，发表在同窗会刊行的第26期《会刊》（1983年10月12日版）上，此表可能有遗漏。根据《建国大学要览》所载：一期150名，二、三期（加入的新三期为80人，此表为85人）234人，四期171人，五期180人，六期185人，七期185人，八期160人，共1406人，比此表多27人。其次，它忘记统计由各大学考入之后期一年生。1940年一期生前期修了，校方于是年招收各普通大学毕业生（包括在职大学毕业生之适龄者）。从一期到五期，每年招一次，人数平均为4—5人。例如三期考入3人，四期考入6人。这批同学未列入入学人数总数，约20名上下。

（三）塾制

“塾”，在我国是旧时民间教读的场所，最早见于《礼记·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后来传到日本。明治维新前夕，日本有名的学者、教育家长州藩士吉田松荫在山口县的下关附近建立义塾，称“吉田义塾”。由于吉田熟通汉学兼懂洋务，便在义塾里传授尊王、攘夷、倒幕，主张维新。培养了板垣退助、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维新八义士”，成为维新的骨干力量……（明治）维新派胜利后，“塾”与吉田的名字深入日本民心。可见“塾”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东西。

建大的塾，在建制上隶属于塾务科，并非行政一级组织，但因其能起奴化的特殊作用，有特殊的存在价值，因而把它当作一种制度看待。

建大的塾，有五种职能。

1. 新生入学后，马上编入塾。每塾在20人左右，不超过30人。在塾头的管理下，在指导学生的具体指导下，塾生在塾中起居生活、复习课业、锻炼组织性、纪律性、集体观点和办事

能力。即所谓“培养共性，锻炼个性”。

2. 建大的“塾”所起的作用：掌握与控制学生的思想行为为主，课业居次。其主要对象自然是中国学生。塾用民族合塾，待遇一致以示“协和”。真正用意在于对中国各族学生起隔离、监视、拆散团结的作用；另一方面用繁琐的宗教仪式、紧张的武士生活，说日本话，过日本式的生活，从思想到习惯、耳濡目染、日久成习，用以进行奴化，以达到彻底日本化。

3. 塾设塾头和辅佐官，掌握一切。塾头是日本名词，即一塾之长，是舍监、学监、辅导员，由副教授、教官一级的日人担当。辅佐官是由一、二期毕业生留校人员担当，是见习塾头。他掌握与控制学生的思想，监视学生校内外的活动，根据学生的特点，因人施教，寓奴化教育于生活中，最终目的是，把日系造就成为殖民者，把“满系”造就成为殖民者的奴才。

塾头以执行塾训育为业务，他们都讲《塾训育》课。该课无固定钟点，围绕时事、政策（校政）、生活现存问题，灌输“建国精神”“民族协和”等谬论。主持全校训务的辻权作少将也亲自当塾头，讲《塾训育》课。

每当学年结束时，塾头对塾生的“塾生活评语”，能解决塾生的去留、升降。因此，塾头的职位虽然不高，作用却颇为重大，可以说，他才是奴化教育的具体执行者。

4. 前期各塾设指导学生，由后期生中的中、日上级生各一人担当，由塾务会议决定。他们同塾生一同起居、食宿。白天上课，下课回到塾来。中国人任指导学生的大多数是爱国的，他们用虚抓塾生活来应付塾头，用“晴渡陈仓”的手段，实抓中国学生的爱国团结。

指导学生的任务是：协助塾头管理日常事务，指导塾生的生活，起示范作用，故称指导学生。他是塾头提名校务会议决

定的。

5. “塾当番”，即值日或值周。由于建大的办学宗旨是养成“躬行实践的指导者”，因此要使每个人都有锻炼组织能力和处理事物能力的机会。为此，建大从不设立长期任职的班长，而是按日字母的姓氏的顺序，挨次值周。在值周时，他是班长也是舍长，在塾头领导、指导学生指导之下，起传声筒和带头人的作用。一般地说，塾头掌握全面，管大事，指导学生管生活、纪律及学习；塾当番则是处理一天里的事务。

在塾当番之外，还设有“塾务委员”，由最高年级学生3~5人组成。大致分工如下：

- (1) 管理伙食的2~3人，可称之为伙食委员；
- (2) 管理浴池，每日开放一次，可称之为生活委员（伙食兼）；
- (3) 管理图书室，每晚对学生开放（看、借、还书），可称之为图书委员；
- (4) 管理统一行动，起床、集合、三餐、熄灯时敲大鼓，可称之为总值周。

以愚民政策为基础的奴化教育

（一）教育特点

1. 宗旨

深刻体会“建国精神”，建设“道义世界”。

《建国大学令》里说：“在于体得建国精神之神髓，研究学问之蕴奥；躬身实践，养成道义世界之先进的指导者为目的。”

如何深刻体会“建国精神之神髓”，作一个“道义世界”的“先进指导者”？

所谓的建国精神，实质是如何看待伪政权，特别是伪政权

与殖民者的关系。殖民者要求中国学生这样认识：

——“九·一八”事变是日帝“为避免满洲为赤俄所侵吞，才冒群疑而不避，犯众咎而弗辞，仗义兴师，解我倒悬”；

——日帝制造伪政权（伪满）是“假我尺柄、授我丘民”（即：日帝通过伪政权，统治3 000万同胞，去建设最终成为日帝直属殖民地的“王道乐土”）；

——日帝在东北的掠夺资源，输出资本乃是“帮助友邦开发”。日帝侵略东北有“理”，压榨人民有“功”；

——“日、满名虽两国，实为一体”，中国人要同殖民者“一德一心”，让日帝永远霸占东北以求“共存共荣”；

——日帝不但是“友邦”，而且是“盟邦”、“亲邦”；“满洲国”不但是“天皇陛下御授威”的恩赐，也是“神光开宇宙”天照大神留下來的“杰作”；东北人民不但要感恩戴德，而且要争取“日满合并”，成为“皇民”；

——中国人要“仰赞天业”，帮助日帝的“大东亚圣战”（太平洋战争）的“完遂”（胜利），最后达到“八紘一宇”的“伟大理想”，即把东亚的“八紘（即八方）放在日本的统治之下，成为“一宇”（日本统一），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这就是建国精神的“神髓”。

所谓的“道义世界”就是要建大学生在深刻体会建国精神的神髓之后，按照日本殖民者训练自己的模式，再去训练自己的同胞，也让他们像自己一样，心甘情愿地认贼做父和附敌为奴。并且不止于此，还要把殖民者一手制造的“满洲国模式”搬到关内去，“让4亿人羡慕3千万”，最后完成把东亚的“八紘”统一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这也就是“大陆政策”的最终目标。能为这“道义世界”（大陆政策）出力卖命的人，就是“先进的指导者”。

2. 特点

为了实现上述教育宗旨，伪建大在培养、训练学生的具体实践上有三大要求：一是教育与政治实践密切结合，就是不从政的人也要了解政治；二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即学以致用；三是文武结合，军训，同时用武士道精神武装学生的思想。它强调：

(1) 行重于知。建大历来提倡：“领导者不只是办公事、发命令，更重要的是带头实干。”干，就是实践。

根据其重视实践，知和行的摆法是：“实践为经，学问为纬。”即实践为主体，学问是辅助。

知，首先是钻研以等级制为基础的“皇道”、“王道”、卖身投靠为敌效命的“建国精神”，然后才是统治人民所需的知识。

行(实践)，在建大是以“塾生活”为中心。在那个日满合塾的条件下，说日语、学日本习惯、过日式生活，亦步亦趋、且学且行，达到一个模式，才算得打下了实践的基础。在此基础上，通过各种训练——军、武(剑、柔、弓、合气武道)、农训，马、枪、剑、滑翔术甚而去扫猪圈、睡牛棚，以培养武士道精神。

正因为行重于知，所以尽管建大生在入学考试时选拔从严，校内考试却形同虚设。升级并不根据考试，塾头的“塾生活”考查结论才是决定一切的。甚至毕业考试，也不过审查一下“毕业论文”和走一个国家考试的过场而已。

因为学习无压力，写毕业论文时又允许借阅禁书作参考，这给中国学生读中国书、读进步书大开了方便之门。

(2) 德重于智。建大对学生的要求是，“陶冶人格，涵养德操及研究学问之蕴奥。”又说：“以修养为主眼”，这样，学问只能是“敬陪末座”，这说明德重于智。

德——性格与德操。殖民者对中国学生所要求的“德”是：

按照武士道精神与风范雕塑性格、涵养道德规范，一直“修养”到能够甘心附敌、与敌同化，变成个准日本人，才是殖民者所要求的德操与人格。有了这样的“德”，再加上知，方能够得上殖民者所要求的标准。

(3) 中坚官吏

“中坚”一词系“协和语”，释为骨干或核心。建大毕业后，经过短期训练，便任命为伪官吏或协和会职员，成为效劳敌人的骨干。

(二) 学习

1. 以基础知识与精神训练为主体的前期课程（预科）。

(1) 训练课

精神训练80节，军事训练430节，武道（柔道、剑道）训练260节，农业作业230节，精神讲话95节，共1195节。

(2) 文化课

自然科学与高等数学365节，人文科学120节（包括政治、经济、哲学诸概论、心理、伦理诸学），历史（包括西洋史、东洋史、日本史、满洲国史）330节，日文300节，汉文330节，第一语学（日系学生学汉文，满系学生学日文）535节，第二语学（按志愿报名编班，英语、德语、俄语、法语、意大利语、蒙古语6种任择其一，另编班，从二年级开始学习）295节，共2465节。

三年总共3660节，一年级授1200节，二年级授1200节，三年级授1260节。

2. 以分科学习为主体的后期课程（本科）。

(1) 训练课

精神训练、军事训练（诸兵种联合训练）、武道训练（柔道、剑道、弓道、合气武道任择其一，合气武道是日本化的武术）、

农事训练（农耕、蔬菜、畜产加工、农产加工）、操作训练（汽车、滑翔机、练习机、机械修理）。

（2）基础学科（共同课）

教学：建国精神、神道与皇道、儒教、诸宗教概论、公务论。

哲学：哲学原论、现代思潮、学问论。

地理学：地人论、地域论。

史学：历史理论、世界史论。

国家学：民族学、国民心理学、统计学、社会学、国家原论、国防论、民族协和论、东亚联合及国民团体论。

文学：国语及外国语、东西方古典。

武学：武道及武术论、战史、军战论、战略论及战术论。

实学：农学、工学大意、医学大意。

（3）分科

甲、政治科（科，相当于学院，但不分系）

一般科目：政治地理、政治史、政治思想史、政治原论、法律史、法律原论、法律思想史。

统合政治论：政治制度、外交政策、东亚政治等共7种。

保安政治论：军法、刑法、警察法、民事诉讼法、商事法、涉外法等共8种。

厚生政治论：厚生政策、农村政策、都市政策、土地政策、人口政策、家族政策、生计政策、保健政策、文化政策。

国际政治论：外交史、国际法、国际政治。

由统合政治论到国际政治论等共4类，俱以伪满及东亚为对象。

补充科目：选定经济、文教两科中之一定科目共通学习。

乙、经济科

一般科目：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经济原论、经济地理、经济统计论。

国民经济泛论：经济组织论、经济制度、分配经济、财政经济、企业经营、计划经济论、经济国防论、东亚经济论。

国民经济各论：开拓论、农林论、矿工论、通运论、贸易论、配合论、金融论、汇兑论、保险论。

世界经济论：世界经济泛论、世界经济发展史。

补充科目：选政治、文教两科中之一定科目，共通学习。

丙、文教科

一般科目：文教史、经学、皇学、道德学、艺术论等共11种。

国民文化：满蒙文化、日本文化、中国与西域文化、印度与西亚文化、西洋中世与近世文化。

国民教育论：教育原论、教育方法论、教育行政论、教育心理学、学校经营论。

国民教化论：教化原论、教育政策论、教育事业论等6种。

世界文教论：世界文教等2种。

补充科目：政治、经济两科中之一定科目共通学习。

3、教学情况

伪建大的师资阵容大致是：名誉教授6名（中国人2，罗振玉和袁金铠），教授37名（中国人2，高起元和马冠标），副教授50名左右（中国人3，迟镜诚、李松五和柯纲安），讲师30名左右，外加几十名助手（助教）。在伪建大的中国教师，有爱国的，有死心塌地为敌人服务的。

前面说的那个马冠标是个汉奸，他是伪热河省省长，帮助日军进攻八路军，失败被免职后，来建大当教授，提起学问一窍不通。前面说的那个高起元（蒙族），他的诗文在国高语文教

科书里有两篇。自称当过溥仪的老师，平日长袍马褂，瓜皮小帽，厚底布鞋，宽边花镜，地道的清朝遗老。他仇视白话文，曾因我们不爱听他用八股的方式讲解古文大发牢骚说：“你们不喜欢八股文，说明你们不知道八股文的奥妙！你们专喜欢白话文，白话文算是什么东西？贩夫走卒操之，引浆卖果者道之，何学之有？白话文只能写出：‘两个白蝴蝶，双双飞上天，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一类的诗来。这是诗吗？狗屁！”于是连骂“狗屁”不已。副教授中柯纲安先生造诣深，教法好。诸子中《庄子》最不好讲，柯先生却把老、庄的思想体系，介绍得条理分明深入浅出，对《庄子》的构思巧妙、想象幻奇、词汇新颖，特别是浪漫主义色彩、寓言的构思精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发挥得痛快淋漓，至今印象尚存。最使人讨厌的是无休止的日本语以及建国精神一类课，到这时，同学们大都在下面偷看禁书，而对于第二语学任何语种，都能刻苦钻研，孜孜以求。

建大哲学老师强调王阳明哲学的“知行合一”中的“行”。指出人格锻炼与素质养成“是行的出发点与总归趋”。把“行”也把“德”都置于优先地位，之所以不重视知，是因为殖民地实行的是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们认为被压迫者“知识越多越反日”。因此殖民主义者在建大甚至提出“不贩卖知识”的口号。

伪建大没有体育课，如果谈到“德智体全面发展”，则是把各种训练权当体育锻炼。因而建大尽管拥有广阔校园，但无像样的体育场，也未开过像样的运动会。

伪建大奴化教育最明显、最突出地集中于史地课。其特点为：歪曲、篡改史实和史观的绝对反动。

建大开4门历史课：把世界史（实为欧美史，并且只讲古代）叫做《西洋史》，把中国史叫做《东洋史》，还有强调“万

世一系”吹嘘“民族优越”的《日本史》以及胡编乱造的所谓的《国史》(东北史)。

《国史》是从古肃慎始,目的在于证实东北地区自古就是独立国,今天还应是日帝卵翼下的“独立国”。胡说什么“东北是满、朝、蒙三族的天下”,“汉族是恃强侵入的外来民族”,“日俄战争时,日本为了邻邦满洲,宁肯赌国运而不顾”,“为帮助邻邦开发满洲,投巨资而不惜”,“九·一八”事变是因为“邻邦满洲为赤俄所侵吞,英美野心覬覦”,日本才“冒群疑而不避……”

在《日本史》讲到“明治维新”时,有意地联系30年后我国“戊戌变法”之失败,苦心孤诣地得出这样一个反动结论:“国家犹如生命,也有幼、青、壮、老、死(灭亡)阶段。日本处于青年时期,故朝气蓬勃,因此不但维新胜利,而且一战胜清,再战胜俄,三战胜德。……强国、大国皆为我所败,……今日再胜美、英,……无疑当可实现。”而中国“虽曾有历史上‘汉唐之盛’,但事逾千年,青壮年期已去,如今衰老垂死,暮气沉沉。故康、梁辈有心谋国,无力回天,以致国事日非,蹙而不振。”用以暗示:“衰老垂死”的中国,只好等“朝气蓬勃”的日本去结束他的生命了。

《东洋史》是以中国史代表东洋,教者山本副教授是个殖民者派头十足的人,对中国学生颇有不屑一顾的神气,其殖民主义观点比比皆是。他把民族英雄岳飞说成是“没有政治头脑,缺乏全局观念”的“一介武夫”,而对臭名昭著的秦桧却加以肯定,说他为中华民族做出了贡献。说秦桧虽为中国人所不喜欢,但他毕竟是一位政治家,他懂得全局,深谋远虑,看得更长远,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者是也。果然,宋金议和,不但换来了百年和平,而且南北经济都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公然颠倒是非,

颂扬起中华民族的败类来了。只有讲到民族英雄郑成功时，这位反动教授，不但无一贬语，而且颂扬有加。他不厌其烦地叙述我民族英雄郑成功与父决裂，坚决抗清，赶走红毛夷（可能是暗以荷兰人指美英人），可惜天不假年，只活了39岁……言下不胜惋惜。正在我们肃然静听，并对他居然也能“实事求是”地介绍“史实”并给以正确评价，从而正欲对他刮目相待时，副教授的真意图亮了出来。他郑重其事地提醒道“国姓爷（郑成功受隆武帝赐给明王朝国姓朱，日本人尊称他为“国姓爷”。）所以能有这样的崇高品质和彪炳功绩，不能不归功于他的日本血统（郑成功的母亲是日女田川氏）并且因为是在日本长大（实际是7岁回国），具有日本人的优良传统，才能够……”

地理课虽不同于历史课，但任课的伊藤副教授还是抓紧一切机会向学生进行奴化教育。讲课时，他总是严格分清敌、我、友，等差有别地给以褒贬，当然是牵强附会、生拉硬扯地进行的。但总是离不开美英及其盟国可恨，最终必败；法西斯德意日可爱，结果必胜。他还以反动的《地政学》观点给法西斯的侵略政策张目。他说：“日本本土局处四岛，地狭人众，资源匮乏，海洋之国，近水文明，素有雄飞之志，绝不可局处一隅，因此必须以满洲为生命线。”“意大利的‘靴子’伸入地中海，地势险要，扼居要冲；古罗马文化武功大张，又是文艺复兴的发祥圣地，由它来制霸地中海，乃是天意民心之所归。”“德意志（日耳曼）民族是优秀民族，但地处四战之地。如果不能东胜俄，西败法，必为所困。并非好战，实乃发展之所必需。”这位“学者”传授给学生的，是这套强盗逻辑。

4. “特别讲座”

（1）日本作家小林秀雄、林房雄先后来校讲授文学和文艺理论；

(2) 日本名僧(忘其法号)来校讲“禅道”，即参禅、入定、悟道一类唯心的玄空哲理，最后，作为结论，纳入“惟神之道”；

(3) 请合气武道(日本化了的的中国武术)的日本名人来校传授技巧、招数；

(4) 请伪满作家古丁(名徐长吉)来校讲文学；

(5) 1943年请日本相扑(日本摔跤)的退休横纲(主将)来校传艺。此人身材高大，艺名天龙，曾在天皇御前(驾前)献过技。我塾“大个子”巴图巴雅尔(蒙族)与他对阵。天龙由于年老，可能在传艺时没有认真对待，竟被巴图摔了个仰巴叉，中国学生大声喝采。为了挽回声望，第二天天龙单搦巴图交锋，未及两回合，巴图便被摔倒。由于天龙的招数过狠，使巴图右臂脱臼，挣扎不起。此刻中国学生一拥而上，背起巴图直奔医务室。天龙面对空无一人的现场，只好搭讪着走开。

(6) 也是1943年，校方请来协和会《青少年指导者》主编姜学潜来校讲演，全体中国学生参加。姜先生是爱国者(1944年被捕入狱，后来下落不明)。他主编的《青少年指导者》以“协和”号召中国青年团结，以做人号召青年爱国，建大生几乎按期购买，人手一册。他到场时，列座整齐的同学们，不是以日式的注目、挺胸向他致敬，而是起立和鼓掌，就像欢迎久别重逢的老朋友，这种场面在伪满是罕见的。姜先生讲的话至今记忆犹新，如：“听说大家都能苦读书，课内钻研以外，课外还能用心读好书，这条路算是走对了，我祝贺你们。青年人难得的是找到正路。要读下去，认真读些于国于民有利的东西，那就是力量。”(鼓掌、会场活跃)“叹苦、哭穷、求人谅解，是懦夫的行为，无用！要紧的是，咬紧牙关苦苦做人！”“大家不要以为生不逢辰，倒霉是事实，一时改变不了，在于你怎么看待？

这一段既然不可避免，你早出生20年，你儿子来承当，晚出生20年，老一辈来承当，倒不如自己来承担。对亲人也用得着自私吗？咱们‘满人’最大的缺点是自私。人人顾自己，谁去顾大家？”真是讲者有心，听者有意。

（三）生活

伪建大学生一律住宿，家住市内也不通读。这既是因为公费食宿，更是因为制度要求学生：“过严格明朗之规律生活，以锻炼身心。”具体情况如下：

1. 繁琐的宗教仪式

建大生活的基本单位是“塾”，叫做“塾生活”。前期塾，一、二年级是平房，一栋房分为三部分：一端是寝室，按日文字母顺序排列铺位，入门处有两排枪架，每人一支“三八式”步枪（军训用）；另一端是自习室，两排（四行）写字台，九盏电灯，够得上宽敞明亮。中间用十字走廊分为四个室。塾头室、盥洗室、厕所、物置室（日本名词，即仓库，每人一个柜，放随身物品），学生的行动以敲大鼓为号（只有上、下课用电铃），叫做“兴亚大鼓”，大鼓声闻几里以外，是名副其实的“大鼓”，中国学生私下叫它“坑亚暮鼓”。

建大一天的生活是这样的：早5点30分起床（冬季延一小时），盥洗15分钟，再闻鼓，由当番带队到操场集合——升旗、敬礼、向裕仁、溥仪所在方向遥拜。行礼如仪后，作建国体操，操毕解散，由当番带队跑步回塾，登床正坐（本是唐代坐式，日本保存下来，实际是跪坐，表示郑重），先齐念几遍“民族协和、王道乐土”的口头禅（中国学生私下叫“念咒”），然后闭目“默念”——考虑一日之计，末了听指导生或当番发表今日行事（日程），再去上早自习。7时早餐，伙食定量，每餐给铝制大碗一杯（日文，一碗）饭，小碗盛汤。早饭照例是苞米粥，午间

大米饭，晚饭或是大米掺高粱米，叫做“白高”，或是大米掺小豆叫做“红饭”，粗细粮间杂的原因是日系配给（供应量）的是全大米，“满系”是全粗粮。为示同甘共苦、“民族协和”，我们“同甘”，日系“共苦”才这样做的。这在各大学还是唯一的特殊（社会上，中国人吃大米犯法）。至于菜，每餐一小碗汤，早餐是土豆胡萝卜酱，午餐四人两盘菜，其中一个是荤菜，晚餐或荤汤或荤菜。在我入学之前，特别是30年代，比这好得多。

吃饭也有仪式。饭前要唱赞歌，由塾头领唱，颂扬天照大神（太阳女神），饭后也唱，再感谢丰收大神（农神）赐给食物。动箸、停箸听指挥，饭前要用日语说“拜领了！”饭后要说“太丰盛了。”1943年以后粮食短缺，每餐一大碗饭根本不够，尤其早饭一碗粥，总是半饥半饱的，但也还要说：“太丰盛了。”

白天，上午上课，下午训练，年级越高，训练递减，下午有时也上课。

晚饭后到熄灯前算是自由时间，也分两段，前段是自由支配，后段是自习时间，这时也可以到图书室借书阅读（原则上是一同自习）。到敲大鼓宣布自习完了，都要回到寝室，登床正坐，听塾头以下的“官”训示、总结然后闭目反省，检查一日的成败、得失（即经验教训），下翌日之决心。再闻大鼓响，宣布准备就寝，各自向家乡方向行大礼，对父母叩首问安。9点30分就寝，不许开夜车，早起则无限制。

2. 紧张的日式生活

建大规定用日语作为民族合塾的公用语言，生活方式也是日本式的。殖民者认为，让中国学生说日语，学日文书，过日式生活，久而久之，自然也就同化了。

殖民者对中国人惟一的慷慨是传授日语，不但认真教，并年年进行“语学检定”，合格者是工作人员，按级领津贴，生活

习惯也要你认真学，只要亦步亦趋，就是好学生。比如，每天的菜，有一半是日式的。“味噌汤（大酱汤）”实在难于享受，就是日本人奉为上品的“真在”（译音，以糖加盐熬小豆，掺以小片面饼，类似农村的疙瘩汤），中国人也吃不惯。不吃，饿得慌，吃长了，也就习惯了。

刚入建大，有些习惯使人吓一跳。如“闹塾”就是一例。日文叫“斯透目”，记得我入学刚一星期的一个夜里，突然电灯全部复明，闯进来一群上级生，有的敲着铁桶，有的挥舞竹剑，有的戴着鬼脸，有的化了怪装，上蹿下跳，呼号喊叫，活像群疯子，一进屋就把我们从被窝里拖出来，要我们同他们一起行动，于是我们只有穿个裤衩蹦跳起来，装着高兴得发了狂。直闹到筋疲力尽，才共唱圣歌象征团结，鼓掌欢呼表示尽兴，接着再到别塾去闹……这种“闹塾”在其他庆祝节日也不例外。还有一关，叫“试胆会”，这是有组织的。新生入学后，学校安排一个晚上，按塾先后集合，发表行经路线及指定挂名报号的地点，然后每隔5分钟出去一个人，一路上都是沟岔野岭，或是三岔路口，要求必须按路线走完，为此，在指定地点要挂名报号（有人在暗处记。这是模仿日本武士临阵报号，叫“纳挽力”）。当你走在昏暗处，有人突然高喊：“投降吧！”你必须怒骂一声，并喊“杀”三声，表示皇军宁肯玉碎（战死），也不降参（投降），当你走进空屋子，在室内昏暗的灯光下会看到青面红发，巨口獠牙，狰狞可怕的鬼怪，这时你要绕它一周，并向他报名挂号。最后，当你走进一个黑屋子，电灯会突然亮起来，三五个日本上级生手执竹剑、木枪向你冲来，你虽然徒手，也要作出反应：摆出冲锋架势，怒气冲冲高声大喊“杀”，才算合格。过不了这一关，在总结讲评时，就要受到学校的严厉批评和同学们的讥笑了。

建大很重视学生的健康，因为它是武士道训练的基础。学生每日必须洗澡（还提倡冷水浴），绝不许喝生水，但洗脸必须用凉水。小病到医务室，大病住院。医院设备齐全，病号饭质量好，护理、饮食与用药，中日学生无区别，并一律公费。

建大不重视田径、大小球类运动，用军事训练、各种武道如柔道等代替体育，认为这样“既能养成尚武精神，学得武勇技能，又锻炼了身体，一举数得”。作体操，除“建国体操”外，还有军事体操，如冲破天、摇地球、伏地挺身、伏虎等。另外，特别重视跑步，在尾高来校后，一切讲战斗化。这是扩大侵略战争时期的必然现象。

3. 战斗的集体活动

我在伪建大二年半，身历目击耳闻的有下例一些集体活动。

每年校庆纪念日（5月2日）、毕业式、新年，届时都要以整为单位，在后期食堂举行文艺汇演。

在校内，尤其是在“勤劳奉仕”时举行营火晚会，点起篝火，奏起乐，边唱边舞，中国学生不善舞，由日朝两族学生垄断。还有个人表演。

一年一度举行武道年级对抗赛。主要比赛剑、柔两道，枪剑术，合气武道只作表演。

我记得三年来，我只参加一次校内运动会，声势不大也无像样的纪录，这同校方不重视有关。

我参加过两次市内大型武道表演大会，全校停课参加。其中一次是“南北满对抗赛”，我校武道教官八木是北满的主将，结果失败。另外市内举行马拉松赛，建大也参加，但从未开过市内或“全国”运动会。

后期毕业与前期修了，都要入营锻炼两星期，体验军队生活。1945年5月，我们六期生前期修了，到军官学校入营，未

到军校之前，军校校方就向全体宣布：“建大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思想不良，来入营时，有老同学、同乡关系者，禁止与之接触。”为了夸耀军校的战斗化，不但要求军校学生行动迅速、准确、武勇，并加强了锻炼服从的嘴巴教育。届时被教育者要做好：双手掐腰、两脚叉开，既显示挨打时也武勇，又防备猛打时被人打倒。进行“教育”者，不是用巴掌，而是用拳击面颊，经常打得口角流血。军校老同学说：“你们快滚吧！我们为你们多挨多少打。”

军校入营后，接着是两周的政治“实习”，分为社会调查与地方服务两种，我报了“满映宣抚队”，是跟随该队到热河，慰问进攻八路军的日、伪军。我们7个同学想去找八路军，没想走到大虎山，这个宣抚队奉命撤回，原因是“治安情况不允许”。

我入学后，每年暑期，都要勤劳奉仕。“勤劳奉仕”一词来自日语，“勤劳”是干苦力活，“奉仕”是作贡献，即无偿劳动。伪建大初期，只做过校内劳动也修过公路，但当时带自愿性质。1942年末，伪满公布《学生勤劳奉公令》，“勤劳奉仕”成为定制。这是敌伪垂死挣扎，强征人、财、物的一种手段。1943年到绥芬河的附近东宁修战备公路；1944年三赴（此前，上级生去过两次）黑河附近的山神府修战备公路；又回到吉林市北部的金珠站修公路；1945年先后到沈阳兵工厂和公主岭飞机工厂劳动。勤劳奉仕期间，因为是打乱年级重新混合编组，这给中国学生上下级的结识、交往造成机会。

为了“涵养武士道风格”和“适应临战体制的需要”，建大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军事演习，时间一般地选在春夏之交，至少持续两天。最大的一次是一期生于1941进行的那次演习，一直“打”到吉林市，最后是乘火车回长春的，共费了一周的时间。我参加的1943年那次演习共进行了两天，上午8时半出发，每

人发三联空包子弹，携带机枪、掷弹筒，如临实战。开始后，一面搜索前进，一面不断发现新情况。一日之间，“两军”交战三次。晚间露天宿营，夜风袭人，大地为床，身下冰冷，本想起来跑步暖身，又怕“暴露目标”，苦苦熬了一夜。第二天又“强攻高地”，这是最后的一战，也是演习的最高潮。因为过度劳累，返校行军时，肩部隐隐作痛。回校后先洗热水澡，当晚伙食大改善，破格地给酒喝，然后放了一天假。

（四）控制、分化、拉拢

殖民者作贼心虚，难免草木皆兵。因而运用假协和进行软化、收买的同时就是严密控制和分化。作田侧重前者，尾高则侧重后者。

1. 虚饰视听

人们知道，日本国内各大学没有一点集会和结社的权利和学术言论的自由，在伪满不间可知，除了协和会，不许有任何公开的组织。建大的“塾务委员会”，并非学生自治组织，只不过做些塾头所不屑作而又必须作的一些服务性活动而已。

建大也有一个不定期的内部刊物，由二期生胡继权负责编辑，此人颇有文采，《新满洲》杂志上曾连载过他写的小说，笔名古梯。内部刊物的稿件由师生提供，但必须经塾务科审查通过后才能付印。它的内容，大都是歌功颂德，鼓吹战争为军国主义服务的东西。说它是御用刊物当是恰如其分。这是建大唯一的学生“喉舌”。

2. 刀光剑影

分化拉拢学生的是塾头。1943年我考入建大后，我所在的十五塾的塾头新田伸二曾决定，全体塾生按姓氏顺序搬到塾头室同他长夜“谈心”。这事非同寻常，同学们自然警惕。据何润森（现名何倩，在北京社会科学院）说，新田和他谈心时毫不

掩饰地挑拨说：“你是满人，满洲是满人的，皇帝也是满人，你才是满洲国的真正主人，你有特殊地位，也有特殊任务。现在，汉人对日本帝国帮助满人建立独立的新国家十分仇视，反满抗日，既抗日又反满，不正说明人家把我们和你们都当成敌人吗？咱们两族才是一家人呀！咱们不能让他们把“王道乐土”搅乱了。现在已经抓起来一大批，但还有不老少。你要多留心，有情况向我报告……”新田的花言巧语，并没有使何润森受骗上当。第二天，他就向同学们说：“你们不知道，我是纯满人，老人姓赫舍里，改姓何。……新田知道我是满人，所以拉我叫我当小特务……”这件事教育了中国学生，大家共同商量好应对之策。轮到我，因为心中有底，所以很沉着。到了这天，新田满面春风，并给我指出一些我并不具备、莫名其妙的优点，我心里想：这叫做欲擒故纵。

接着他就让我讲讲入建大后的感想。我用半生不熟的日语，絮叨不休地把建大吹捧一番，他默然地听着。为了争取主动，我向他提出去日本旅行的要求。他看我想当官，就告诉我一个秘诀：“要想当官就必须亲日。”接着，他问我的家庭情况，同塾的学生跟谁好？马维同是不是我的同乡（马维同是刚被逮捕不久的四期生）？至此，我心情开始紧张起来，表面上还装着漠不关心的样子说：“马维同是富锦国高的，我是佳木斯的，我与他刚认识，我们之间相距100多公里……”新田可能感到从我这里再捞不到什么，“谈心”也就到此结束。我如释重负翌日撤回，暗中庆幸总算过了这一关。

建大是7个民族按固定比例入学的，是多民族汇集的学校。殖民者实行民族分化，汉族学生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平素对其他民族的同学注意团结交朋友。我和蒙族同学巴图巴雅尔是好朋友，我喜欢他那坦率的性格。他告诉我，一次新田拉拢他

说：“清朝对蒙古人最好，日本国对蒙古人也好，入建大有照顾不是证明吗？日、蒙两族要能联合起来就好了……蒙族同学人少，汉族如果欺负你们，我给做主。”新田对十五塾实行民族分化，制造民族对立，其他塾头也是这样。他们的办法再多，但大多数同学都有警惕。个别少数虽有受骗上当的，但迟早终能觉悟过来。殖民者的算盘最后还是落空了。

再讲一个例子。大家知道，在伪建大，殖民者把学生分成“满系”（因为他们不准东北同胞称自己是中国人）和“日系”。朝鲜、台湾当时为日属殖民地，所以朝鲜和台湾学生也被划为“日系”。但殖民者这种笼络是很难生效的。比如一次中、日学生争论谁归“满系”和“日系”时，平时沉默寡言的台湾青年吕芳魁突然站起来，庄严地声明：“我不是满系也不是日系，而是华系，是中国人民的子孙！”为了报效祖国，他两次跑去解放区。第一次在山海关被捕，第二次逃入关内后辗转各地，最后才到晋察冀解放区，参加了八路军，改名李子秀。不幸牺牲（解放后于张家口市烈士陵园树碑纪念）。李烈士是三期生，该期逃入关内参加抗战者前后共11人，建大像他这样投奔祖国者虽无精确统计，估计约在60~70人之间。

为了祖国

事物总是向对立面发展的，就像清末练新军为的是维护反动统治，结果武昌起义正是在新军中发生那样，伪建大殖民者的一厢情愿也被中国学生的爱国集体所否定。

（一）第一课

我是伪满三江省（今黑龙江省合江地区）佳木斯国高1942年的毕业生，和本班同学王希儒一起考中了建国大学的第一试。我们所以考建大，一是因它的待遇好，有出路；二因它是六年

制的“最高学府”，一定会学到不少的东西。不过，也听到建大出了不少思想犯，心想：抓思想犯也没啥要紧的，好好念书，不问政治，总不会不犯也抓。于是我们高高兴兴地去应第二次考试。

到建大后，四期生负责招待我们，晚饭两个炒菜一个汤、大米饭，当时对“满人”公开吃大米感到新奇，蹩脚的是吃饭之前要默祷，无人肯做。负责招待的四期学生刘万堂对大家说：“为什么不默祷？不要以为这是他们的规矩，咱们祖国也默祷，大家还是默祷吧！”这使应考学生受到很大震动。因为在大庭广众之中说“他们”“祖国”这些词，对于我们这些国高生来说不但陌生，简直是可怕。就寝时我小声对王希儒说：“果真是名不虚传啊！”王答说：“这家伙也真够大胆了！”

考上建大，全家为我高兴。入学后，我把中国的指导学生看成同日生一样是蹩脚的“坐探”，对他俩处处提防，不久，有一件事改变了我的看法。有一天，日系指导生佐野孝一郎去蹩头新田家，“满系”指导生万兴治在晚饭后给我们讲去年抓思想犯的情况，他说：有的拒捕，被日本宪兵打昏，抬上囚车；有的被折磨，病死狱中。被抓去的16名建大学生，个个表现得非常勇敢。他越讲越起劲，我们越听越出神，以致竟无一人自习。这件事使我认识到伪建大的中国学生，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是一些贪图功名利禄、附敌为奴的无耻之辈。相反，他们是一群热血的青年，他们大多数是爱国的，身在“满洲”，心怀祖国。如我蹩的第一任指导学生万兴治（三期生）经常告诉我们，爱国是建大中国学生的传统，一定继承下去，不能中断。第二任指导学生张玉林（二期生），为人和善而诚恳，总是以满腔热情对待蹩生。他同万兴治一样：虚抓蹩生活，实抓“满系”团结，督促同学多读祖国和进步的书。

为什么伪建大早期学生爱国热情那么高？以1938年5月入建大第一期的55名中国学生来说，他们都是旧制高小毕业的，有些人念过旧民国的初中，至少念完小学，有的并参加过那时的反日爱国运动；其次，他们年龄较大，是在全东北选拔出来的，学习基础好，除了人数少于日系（95名），文化素质旗鼓相当，自尊心强；再次，当时祖国正在抗战，抗联正处于活动高潮时期，前途充满希望。因此他们入学后，思想活跃，注意团结各少数民族的同学，暗中互相传看中国书、进步书，唱进步歌曲，他们主张：“凡是日本同学能做到的我们也要做到。”他们互称“咱们人”，对亲日的“咱们人”，找个借口饱以老拳，并给以悔改机会。一期生是第一批指导学生，他们向下班生传授爱民族、反收买、反奴化的经验，并给指导学生留下了“虚抓整生活，实抓满系团结”的好传统。

（二）团结一心

在建大，中国学生是团结一心的。在风雨同舟的条件下团结的核心是爱祖国，爱国有凝聚力，所以能够一条心，团结的程度，达到了同学之间不问相识与否，也不管是否了解，也不问政治倾向，只要是中国学生就能够谈心，并且是倾心相谈，无以顾忌，谁也不怀疑对方会不会愚弄自己或出卖自己。

在伪满各级学校里，根据等级观念，规定了下级生必须服从上级生，为的是从学生时代就养成“阶级服从”的习惯。下级生要向上级生敬礼，遇事听吩咐，上级生有权打下级生，不许反抗。只有在伪建大，中国学生的上级生从不打下级生，做到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上下级生之间不论年龄只论年级，以年级代年龄，以大哥、老弟亲昵相称而不称呼姓名；大哥对老弟爱护，老弟自愿听大哥的和尊敬大哥。这种关系虽然带有封建帮会性质，但在敌伪统治下，它是一种联系的方法，是当时

反满抗日的需要，因此它有深厚的时代色彩。

因为中国学生一条心，所以一有消息，立即传开。1943年4月18日，日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战死，一个同学看到了报纸，大家三五成群地马上议论起来：“山本为什么死在飞机上？”“舰队是否被全歼了？”到晚间自由时间，议论得更加热烈了。一致认为：所罗门海战是日舰队的灭顶之灾，不被全歼也是溃不成军了。日本是海洋国家，制海权就是它的翅膀，如今被剪掉或打伤了，这个“鸟儿”寿命也不长了。这是刚刚入学一个半月，全塾中国学生就能够互不隐讳地大谈日本必败，说明了这个群体的团结。

这年9月，意大利向盟军投降了。同学们高兴得无法形容，甚至在日本同学面前，也无法掩饰自己的内心喜悦。为了痛痛快快地抒发欢欣鼓舞之情，我和同塾的两位同学买了冷食和酒，冒着下午旷课的风险，来到南湖公园的树下，举起酒瓶说：“为法西斯阵线崩溃，抗战即将胜利，干杯！”“咱们这是干瓶，一定干了！”我们都不会喝酒，如果干了瓶，也就都醉了。真是兴高采烈，乐不可支，甚至在草地上打滚，就像个小孩子，若非互相信赖，谁也不敢这样推心置腹。临走，把酒瓶一个个掷投到南湖里，说：“日本的旗舰沉没了！”“又是一只！”这一天，中国同学几乎都有纪念表示，我们同日系同学的情绪完全是两个极端。

（三）读祖国和进步的书

传书，是中国学生自发反抗奴化的一种形式。因为殖民者进行奴化教育主要是靠书本，中国学生也以书本对书本，让祖国的书占有阵地。传书的方式，一是老生利用同乡、同学、亲友等关系传给新生。我在建大入学的第二天晚上，突然一位一期生来找我，自我介绍叫刘象乾，又名刘太恒，富锦县人，我

的同乡。一阵寒暄之后话归正题，他告诉我“要好好团结同学，因为建大讲团结”，他把中国同学叫“咱们人”，要我多看一些有用的书，说罢，从怀里摸出周谷城著的《中国通史》上、下两卷书，问我：“喜欢看吗？”我只好连声说：“喜欢，喜欢！”“你看完后咱们唠唠，还可以再给你借。”又告诉我不必担心耽误课程，只要不犯纪律不旷课就降不了班。不爱听的课也可以不听，不过要好好保管，防备塾头翻书。他走后，我一时很惶惑，虽知这位上级生关心我，但我又怕万一被塾头翻去不但书念不成，还会有想不到的危险，到底应该怎么办？一时没得主意，我只好把书藏在写字台一头沉的底下，慢慢想好再说。

不料刘走后的翌日晚上，又一个素不相识的老乡来找我，自我介绍叫张宝善，依兰县人。谈话的口吻同刘象乾一样。不知哪位同学说了一句“老蒙古”，这位比我们只高一年的张大哥马上掉过脸来，严肃而略带笑容地说：“老弟，别这么说，蒙族也是咱们自己人嘛！对自己人不能有这种情绪啊！”看他那诚恳的样子，我很感动。临走，这位张大哥递给我一本《大众哲学》，这书我已“久仰大名”了，听说建大的学生看《大众哲学》的，不是被抓思想犯了吗？我赶忙声明已有了三本了，看完后我再到你那儿取。送走他，我又觉得很抱歉。

这几天，不只我应接不暇，其他新生也都从上级生那里得到不少进步的书。

从二年级起，我也能像帮过我的上级生那样向新生老乡讲“建大中国学生的爱国传统”，也能把书传给他们了。

第二个方式是有组织的，利用校方规定的上班生带下班生“兄弟塾”之规定，“合理合法”地传书。由后期传给前期三年级，再由三年级向下传下去。这种传书统称曰“读书会”。事实上并没有读书会的组织，但确有其事。

所传的书大致可分三类：一是：以周谷城、肖一山、李鼎声等人著的祖国历史。使中国学生了解我是中国人。第二，主要是20年代日本“思想自由”时代岩波文库版的书，其中河上肇、河合荣治郎著作居多。还有《资本论》、《布尔什维主义》，中文书有《大众哲学》、《马克思小传》、粗糙纸印的《新民主主义论》、《新哲学大纲》、《列宁传记》、《西行漫记》、《女兵》等。为了寻求左派著作，五期生陈杭（现名陈亢，驻马来西亚大使）等人到研究院把书弄到手，夜间分工抄下来传阅。第三是国民党的书，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还有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

当时看书的方式多种多样，比如，授课时如遇建国精神及日语等类课，就把一本外语书放在桌下，如果老师巡视，就把所看之禁书推到外语书的里边；在自习室看书，有人负责警戒（打更），通常由指导学生和塾当番担任。塾头进屋总是先到指导学生跟前，如果他不在，就由塾当番迎上去向他“汇报”一天的情况，大家听到塾头讲话，马上藏书、换书。等塾头巡视时，人人看的都是课本，并且装得很热心，他便满意地走了（日系指导生从不巡视）。至于最犯禁令的书，只有到南湖去看，那里人少树多，看书最安全。也有人周日到教室去，把门倒锁，如果有人开锁，就从地板的管道入口处由地下跑到另一个出口，走到另一个教室，可谓用心良苦，上述方式仅是就个人所知，可能还有其他方法。

校当局对中国学生的读书活动是早有察觉的，他们不搜全体却搜个人。一次是七期生陈煜武（现名陈坚，东北电力学院院长）的《大众哲学》被中岛塾头搜去了。为给陈以处分，他叫指导学生宋立生（现吉林财贸学院副教授）搜集陈的材料，宋给陈说了若干好话，中岛不听，坚持要报告塾务科。宋说：“在

塾里发现共产书，对塾头和指导生都不好，莫如严格教育，再看他的行动为好。”宋的这番话真的打动了中岛，最后由他自己草草处理了事。

另外一件也发生在1944年，被称为《真理报事件》。这件事的经过是这样的：我的上期生刘士泽（现辽宁省社会科学院中日关系研究员），他俄语学得好，当时学校研究院资料室藏有苏联的《真理报》。他想，要是能看它，了解一下苏联的情况该有多好。但一个殖民地的学生，要看这样的革命报纸，在殖民者的眼里，那是一种犯罪的行为。说也巧，就在这年（1944年）冬季的一天，下课后刘士泽在返回塾舍路经研究院时，突然发现资料室的门没有上锁，室内空无一人，他想，这是天赐良机，于是他悄悄走进去，一看玻璃书柜里有一大叠《真理报》，“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他急忙拿了几份赶快离开。然后找个隐蔽地方，兴奋而又紧张地翻译几篇该报的《社论》和苏德战争、中国抗日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战况的报导，准备在同学中传看。由于麻痹大意，不久报纸便被塾头翻去，而他本人尚未发觉。后来在“刑鞠”之后，被塾头赶出了学校。殖民者明知道中国学生在课堂上经常偷看进步书，为什么只搜查个人而不搜查全体呢？一次，我问一期老大哥刘太恒：如果日本人下令全体空手退出教室，然后换桌翻，岂不完全暴露？他笑道：“不会的，日本人不是不知道，而是不敢这样做，这叫做投鼠忌器。你看这是个什么学校？不是民族协和试验园地的最高学府吗？如果抓住中国学生都看中国书，怎样处理？如果不管又何必抓？如果上报，副总长咋办的学？即使不管总长而报告给关东军，关东军怎么处理？是全部逮捕还是关闭建大？这个影响他怎么承受？”他的话很现实。所以一直到八期都是这么看，从未公开抓过一次。

(四) 学唱中国进步的歌

伪满流行歌曲可分两类：一是歌颂敌伪的亡国之音；一是消极颓废、淫秽下流的靡靡之音，也是亡国之音。传统的《苏武》、《黄族》等高尚气节的歌曲都不许唱，革命歌曲更不必说。但是，建大的中国学生却背地学唱祖国进步歌曲和革命歌曲，还有一部分国民党歌曲。如革命歌曲有《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进步歌曲有《毕业歌》、《锄头歌》、《夜半歌声》、《开路先锋》、《苏武》、《黄族》、《满江红》、《蓬莱阁》……国民党歌曲有《国歌》、《总理纪念歌》等。这是同传书相伴而行的一项活动，每塾总有那么一两个人搜集这些歌曲再教给大家。进步的与传统歌曲能公开演唱，我入学时，“新生欢迎大会”上四、五期生演出了《毕业歌》、《开路先锋》、《满江红》，二期生戴励明身着工人装演出《开路先锋》，三期生刘承舜同一位蒙古族同学合唱《蓬莱阁》，歌词中有：甲午年土地削，甲辰年主权堕。甲午年是1894年中日战争，甲辰年是1904年为抢夺中国东北而进行的日俄战争，都同日本有关。

(五) 说中国话

在东北殖民地，尤其是在公共场合，只要会日语，就只准使用日人规定的“公共语言”——日语。但伪建大的中国指导学生发表事项时用的是中国话。塾头问：“为啥不用日语？”答：“说满语，能够传达得彻底，这是因为要彻底贯彻。”同塾日系学生也问我们：“为啥互相谈话不用一句日语？”我们说：“你们为什么不用一句‘满语’？”日生说：“汉语太难学了。”我们也说：“日语太难学了。”大家都认为，中国人说中国话，不忘祖国历史，就不能亡国。

(六) 和日本同学交朋友

在建大的日本同学，除少数反动者外，多数还是好的，他

们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

我塾龟山淳一，为人公正直率，性格开朗，同中国同学平等相处，后来他被强征入伍，葬身异域，中国同学无不为他惋惜。1945年初夏，在儿玉公园（现胜利公园）举行全市“欢送”各大学无辜日本青年强征入伍大会，这批人是年龄最轻的（各大学的日系学生这一次几乎征光了）。这一天，建大到场早，解散休息时，我与同期不同塾的秋田（可能名快次郎，本期有两个姓秋田的）同学相遇，他的妈妈扯着儿子的衣袖，叮嘱儿子要注意身体，只说了几句便泣不成声。秋田也哽咽着说：“刘君，我的学生生活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吗？”老妈妈补充说：“还是你们幸福啊！”话虽简单，但其言也哀、其情可悯，这是饱受法西斯高压的日本人民反战情绪的曲折反映！

日本同学同我们天南海北来到一起，联席起居共同学习，有些和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42年初，日本宪兵队对中国学生进行第一次逮捕时，有一位日本同学把自己事先听到的消息透露给中国同学，敦促他快逃走。事件发生后，中国同学发起募捐，送给入狱同学，一些日系同学也踊跃参加。在慰劳狱中同学时，日本同学也派去代表，因此受到宪兵队狱吏的责骂，此情此义感人至深。这不只是同学间的情谊，也是同情与支持中国同学反帝爱国活动的表现。1944年夏，二期生为参加毕业实习活动，随塾训导石中广次到了热河。那里是八路军活动地区，敌我斗争激烈，石中这个法西斯野兽用杀俘虏考验中国学生的政治态度，他把一名俘虏（据说是一位资助八路军的农民）绑在木桩上，先向学生训话，要求用杀俘虏来表明“拥护剿共”和体现武士道精神。他先要中国学生执行，结果无人应命。石中恼羞成怒，又要求日系学生执行。他满以为一声令下必有应声而出者，出乎意料的是，还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石中无法下

台，只有在破口大骂之后，自己去动手杀害我抗日志士。这是一次严峻考验，它不只表明日本青年学生对我民族的同情，也是他们对本国法西斯侵略者的屠杀别国人民的残暴行径的抗议。日本同学的正义行动使日本法西斯分子大伤脑筋，以致教务科长青本大骂日系同学“忘本”，藤田松二教授大骂日本同学“堕落”。这些反动分子，哪里知道真正“忘本”“堕落”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

伪建大的结束

1945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年。这一年日帝投降在即，伪建大的命运也同日帝的命运一样：日落西山，黑云一片。由于强制征兵，使日本教师被征走五分之二，日本学生被征走五分之四以上，致使全校人数不及平时的二分之一；更为严重的是强征劳动力。伪满政权宣布：“这次勤劳奉仕时间，直到大东亚圣战胜利为止。”这样就像征伪军那样，国兵需当劳工，而且是无限期的。于是，七、八期生在校作农活，四、五、六期生到公主岭做工。作为学校，伪建大不只是瘫痪了，而且是只剩了个徒有虚名的外壳。

8月14日上午，在公主岭的四、五、六期生接到关东军第三课电令，要伪建大学生立即返回。同学们估计：一个可能是当炮灰；一个可能是集体屠杀。因此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到下午5点集合时缺员13名，出发后，一路上大家想的是什么时候逃和逃到哪里？到了第二天，逃得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的人了。我同四期生路策珂、王绍策商议好，先逃到农安县伏龙泉我姑母家，到陶家屯再离队。带队的五十住看到人员所剩无几，连点名的勇气也没有了，只好等待听完广播再说。到了中午，从广播里我们听到的是日皇且哭且读的投降诏书。祖国光复了，日

本法西斯投降了。伪满洲国垮台了，东北3000万同胞回到祖国的怀抱，大家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每个人的两眼都滚动着泪花，呼吸也感到自由了。就在同学们的欢笑声中，这所经营了8年的殖民地大学——伪建大被送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附录：

“新八期”——1945年春，刚刚开学不久，建大校门的石墩上又挂起个新校牌——“国立新京师道大学”。伪文教部成立这所大学是为了培养国民高等学校的文科师资；原有的吉林市八百零七老师大专门培养理科师资；新京女师大培养女子国高的师资。由于没有校舍，伪国务院决定使用人少房子多的建大一部分校舍。由于占用建大校舍，借用建大的师资，使用建大的图书馆和教室，建大副总理军陶尾高又多了一个头衔——新京师大校长，建大教授重松博士任该校教头（教务长）。1945年3月15日，51名新生入学。

新京师大开学后，上级生给我们传来了话：“要把新师大同学当做自己的又一期新同学看待，一切按‘建大规矩’办，不可有丝毫歧视。”因此，前期生也称他们为“老弟”——像建大内部称呼一样，传书、教歌也同样进行了。他们原以为“在最高学府借地办学一定会受歧视”，“想不到处处是关怀和温暖”，他们也亲昵地称呼我们为“大哥”，双方和谐一致，甚至称之为“新八期”（因为1940年另收了一批“新三期”，他们比老三期晚入学。师大也比建大的八期生晚入学半月，此名由此而来）。但这个“新八期”，只存在了5个月就结束了。

（摘自《吉林市文史资料》第四辑）

回忆我到大同学院受训的经过

王裕五

1942年6月，我充当伪满洲国政府通化省通化县县长，10月初接到伪通化省公署的公函通知，命我在10月中旬某日赶到伪新京大同学院受训。通化省公署人事科长井上对我讲，中央国务院计划，要在本年度内对全国100余名县长，分三批在大同学院进行短期的（两个星期）轮流集训。时间虽然很短，总算你们这些县长和大同学院也发生了关系。这就是所谓之满洲国的中坚官吏，是必须要经过大同学院训练这一阶段的。我得命后做了一番准备，按照指定的日期，赶到伪新京南岭大同学院报到。第一批受训的共有48名伪满县长。

在第二天的开学典礼上，伪国务院总务厅次长王允卿和地方处、人事处的人前来参加。首先由大同学院院长井上（日军退伍的陆军中将），对我们这批前来受训的48名伪县长讲话。他概括地介绍了学院的沿革情况，说大同学院是属于国务院总务厅直接管理，是以养成和训练满洲国官公吏的唯一独特的教育机关，其目的既不同于一般的大学校专门注重学术，也不同于其他各部成立的训练所全力讲授业务。它是一个以满洲建国精神为主体、以推行满洲国策为内容，而对于满洲国中坚官吏，实行综合性训练和养成为目的的。他说，满洲事变之后，以于冲汉先生为中心，在奉天成立了地方自治指导部训练所，向各县派遣了指导员，而在大同元年3月，随着满洲国的建立，便废止了地方自治指导部，其事业乃由国务院的资政局所继承，训练

所迁移到新京的南岭。而在大同元年的6月，又将资政局的官制废止，其附设的训练所亦将解散，然而对于直接参与推行国策的官公吏，进行某种的养成和训练又为当务之急。因此，乃于大同元年7月，政府公布了大同学院的官制，当时收进学员将近百名，进行了4个月的训练。在当年的10月间，有大同学院的第一期毕业生在满洲国出现，分配在奉天、吉林、黑龙江各省和中央的各部院。接着他说什么，为了建设王道乐土，为了刷新旧恶的县制，使官公吏涵养为王道乐土而敢于英勇牺牲的根本精神，乃是本大同学院的教育方针。因此，大同学院的授业科目，有建国精神、军事训练、国文和日本语、满洲国策、邻邦事情以及地方视察和见学旅行等等。他说，为了训练学员养成一种服从纪律的精神，学院实行军队式的团体教练，并有马术、柔道、剑道和实弹射击，以养成学员们大无畏的勇气。随着国势的进展和为了满足国家的需要，大同学院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办法，一种是招考日本内地各大学的毕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历者，不分其中、日国籍，合格者一律兼收，在本学院经过一年的养成和训练，然后交由政府机关选用，称第一部生；以能够理解日本语的现职“满洲人”官吏为条件，在本学院经过6个月的养成和训练，然后按照其各人的毕业成绩，由政府重新分配其职务，这一类的本学院则称之为第二部生。几年来由本学院毕业的一部生和二部生，都发挥了它的积极作用，在中央各部院则有参事官、科长和事务官，在地方各省、市、县，则有参事官、副县长和县的科长。其中有很多的优秀官吏，今天都成为你们这些县长们的得力的助手，这是大家所公认的。接着他进一步说，现在政府为了使大同学院的精神，能够普遍地在各市、县的地方上开花结果，以便于更好的推行国策，国务院委嘱大同学院，要在本年内对全满的各县县长，进行短期的训

练，其目的就是要使各位县长，在大东亚圣战的鼓舞下，能够更深刻地体会到满洲建国的真精神，以便于在实际执行政策法令上不致迷失方向。为了使各位县长能够更明确地掌握国策，学院方面和政府当局，取得了紧密的联系，对于几项有关的重要法令，学院方面正在聘请各部主管的权威者给诸位做讲师，有什么疑问地方可以尽量提出来共同进行讨论。最后他说，尽管这次学习时间很短，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通过这次学习，今后要经常地和学院方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大同学院方面是要把你们这些受训的县长当做第三部的毕业生来看待的，你们不会不满意吧。意思是说，能够在这个大同学院受训，应当感到光荣和大有出路。无怪乎当时的人们说，大同学院是伪满官吏的镀金炉，甚至有些人拿着大同学院的毕业证书，作为他充当伪官吏的护身符，一出门（大同学院毕业）就是高等官试补，再一步就是伪满的荐任官，接着就可以一帆风顺地当上科长或参事官，掌握部分的实权，成为敌伪政权的帮凶。从上面大同学院院长井上的讲话中，人们自然也能够体会到建国精神，明确掌握国策，其目的也正是要你认贼做父，甘为日本侵略者的附庸。

第三部生（伪县长们）训练内容，和第一、二部生相比，看来是有些不同。它早晨没有早操，晚间又没有自习，既没有所谓之军队式的团体教练，又没有柔道、剑道、马术和实弹射击。每天上、下午各有一堂课（二三个小时），都是有关各部门的负责者，来给讲述其所主管的法令和 policy。其中有如伪国务院总务厅次长王允卿，前后两堂讲的是伪满洲国政府的组织法和人权保障法。他口念条文大谈其立法的精神，但是他自己也知道这纯粹是在瞎混。记得他曾这样说过：法是死的，人是活的，往往是同样的事件，而其在法的运用上，有时候也要因人而异，所

以有一句俗话说得好“定法不是法”。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你们大家都知道，我王允卿过去是个学法的，按规定学法的只能做个大司法官，而今天则不然，我也能做到一个一般的行政官，总务厅的混混。最近政府又决定派我为满洲国的驻日本国大使，因此我这个司法界出身的人员又做了政府的外交官，所以说这就叫做因人而异。他又接着说，按照国家组织法的规定，有立法院和监察院，但是事实上这两个院已早就不存在了。这也是因人而异的关系。国务院总务厅，并没有驾于各部之上的规定，但是事实上它又干预着各部的事情。所有这些也叫做因人而异。他又说，地方上的县长，按规定你们有一定的职权，但是如果你运用得不妥当，就往往要事倍而功半。因此说一切的事情，你都要先能通金大度，尔后才能运用自如，否则，只能与己不利，于事无益等等。当时我听到这位大人物的一番讲话，实在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据说是为了要我们这些伪县长们更深刻地体会到满洲建国的真精神，大同学院特请了伪国务院总务厅的人事处长星子敏来给我们讲这一课。这一天星子敏趾高气扬地走进了课堂，他把日本国小学教科书上的迷信神话，当做他们日本国的历史来讲，从所谓天照大神的神话故事起，扯到日本皇室的万世一统，从所谓八纮一字的欺人鬼话扯到日满协和共存共荣。他说什么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留下的神种，日本天皇应该受到东亚人民的尊重，说什么大东亚圣战是八纮一字精神的体现，现在的满洲国就是大东亚共荣圈内各地的典范等等。在当时尽管这些伪县长们没有什么民族气节，但是对他鬼话连篇，我相信谁都会感觉到不耐烦，然而在表面上还都肃然不动毫无表情，一直听他叫唤了三个多钟头，直到他走后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我心里想，所讲之满洲的建国精神，在这一点上恐怕大家体会得更深。

在这个期间关东军司令部的参谋某中佐给我们讲了一堂大东亚战争和珍珠港的赫赫战果，他要大家相信日本陆、海、空三军的威力，动员满洲的一切资源，来完成圣战，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的实践部长何春魁也到学院讲协和会中央联合协议会的组织。他说什么宣德达情是协和会的使命，众议统裁是中央联合协议会的基本精神，各位县长兼任协和会的县本部长，也就是政府和协和会之间表里一体的体现。

此外，还有伪民生部劳务司的科长讲有关各市、县紧急供出劳工的事项，伪国民勤劳奉公局的半田局长讲关于国民勤劳奉公的法令，伪兴农部的司长吕作新讲有关兴农合作社和粮谷出荷的问题，伪民生部保健司讲述国民的卫生保健问题，伪经济部税务司讲述地方税征收问题，伪开拓总局讲述20年百万户的移民政策问题，伪国务院总务厅地方处讲述县、街、村地方自治问题等等。伪国务院总务厅地方处以东道主的地位（地方处在当时是全满各市、县最高的监督机关），曾和大同学院联合举办了几次受训伪县长的座谈会，在会上伪县长们提出了几项要求中央各关系机关加以注意的问题。记得其中有：一、关于各县兴农合作社职员の品德作风问题。二、关于加强对于勤劳奉公队大、中、小队长训练的问题。三、关于原住民和开拓民之间的和睦共处问题。四、关于紧急供出劳工的家庭生活照顾的问题。五、关于工、矿企业现场安全生产的问题。六、关于紧急供出劳工的劳动保护问题。七、关于劳工住宅区的环境卫生问题。八、关于地方风土病（通化地区的大骨节病、克山地区的黑死病，农安白城子地区的鼠疫病、热河地区的粗脖子病等）的医治问题。九、关于经济作物地区的居民粮食问题。十、关于南、北满县长的互相交流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当时

有关方面解答得是很好，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做到，这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

所谓两个星期的训练，也不过转瞬之间就算过去，伪县长们欢欢喜喜地在“再见”声中各讨方便了。

伪满吉林师道大学的片断回忆

张国栋

1943年2月我考入伪满师道大学二班（中文系），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我正读三年一期。由于日本法西斯这时节节败退，因此加强了对东北人民的掠夺和统治。那时我们名义上是大学生，而实际上是亡国奴。下面我讲一下这个时期伪师大情况：

几易校名和校址

日本帝国主义为长期统治中国，1934年8月成立伪满洲国高等师范学校。1940年在新京（长春）成立高师女子部。至1945年“八·一五”12年间，这所学校毕业生约2000名左右。校名改变二次：1934年8月至1938年底，四年半时间名叫高等师范学校（简称高师），有一期毕业生。1939年初至1941年末，改名为师道高等学校（简称师高），有三期毕业生。由1942年至1945年8月15日，又改叫师道大学（简称师大）。我是1943年初入学的，也是改名师大的第二年。

师大校址在吉林市西郊八百垄（冯家屯，现东北电力学院校址），占地面积约5平方里，是“九·一八”事变前张作相创

办的吉林大学旧址。学生们节假日上街买东西得步行5里多路到临江门，再行四五里才能到河南街、粮米行（现北京路）。

学校机构和教学情况

我于1943年春入师大时，校长日本人（当时叫学长）是阿部忠孝，几个月后阿部病死，以后添野信为校长。当时学校有教务科、总务科、学生科，科以下有股。除校长以外，斋藤茂（教历史的）权力最大，他还兼教务科长。各科、股长都是日本人（当时称日系），一般职员大部是中国人（当时称满系）。

全校学生共分9个班（系），一班是国民道德班（政治系），二班是中文系，三班是史地系，四班是数学系，五班是理化系，六班是博物系，七班是音乐系，八班是美术系，9班是体育系。三年毕业。因为各年级都分为九个班，这样全校就有27个班。每个班有学生三四十人，有班长一人，我们班的班长是梁国璋。各班全是男生，女生都在长春师大女子部。女子部归吉林师大本校领导，只不过单任一人作女子部主任，在长春作管理师生的工作，下设有分校式的各种行政、教学机构。

我们入学后，一直到第三学年，教我们班课的教师还记得有以下几人：教中文有陶明浚（外号叫陶圣人），他注释出版过《诗经》、《书经》、《易经》、《论语》等书，因而上课就讲这些书。讲《诗经》时，引用一些男女爱情的故事，不涉及政治方面的内容。离下课还有一二十分钟时，就由兜里掏出怀表看看，过了三五分钟再看看，一堂课得看五六次。铃一响，挟起一个黑皮包就走，等同学们站起来，他早已走出教室门口了。赵香墀教师，是个南方人，讲话多少带些江浙的口音。他讲清代文学，上课时经常引用些文学上的故事，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周士升教师，是教我们书法的教师，他由“永字八法”讲起，常常

讲起他怎样给伪省长徐家桓代笔（就是代替写字），他说江沿宾宴楼（现在儿童医院楼，伪满时是个大饭店）上“东南第一家”那块横匾，名义上是徐家桓写的，实际是他代笔。教我们日语的教师是迟锦诚，他是伪商师第一期毕业生，日语很好，毕业后留校做教师。教英语的是谢中老师，他是留英的，在街里办过不少期英语及数学补习班，在教育界很有名望。迟教师、谢教师教课都比较认真。教我们教育学的是杨志裕，历史是北山（日系），心理学是高山（日系）。地理是李永藩，他上课开始讲几句日语，然后大部时间用汉语讲。给我班上军训课的是大山（日系），打学生是“家常便饭”。一上课就说：“我在中国（指关内）作战，杀过3000多中国人，你们这些小子不听话，我一样杀你们。”他老婆是学校打字员，长得年轻漂亮，因而我们背地叫大山为“大山龟”。

教其他班的教师现在记得的有日系：西垣久实（数学博士）、阿部襄（生物学博士）、高藤茂（历史）、池田（美术）、酒井、高山、小林（体育、军训）、奥山、迫田、茂木。满系：万金声、马崇林、李国栋、王恩显、董清才、王迪光、郑臻等人。

我们上课没有固定教室，早晨用褥垫或书包夹着教材和笔记本，到各科指定的教室去上课，这堂课在东楼三室上，下堂课就可能到西楼四室上。全学年合班上课就在大教室，分班上课就在小教室。没课时可以到图书馆看书或回宿舍自习。

教师上课没进度，无计划。学生考试不发表分数，不排名次，没听说有降班的（留级生），但有因病休学而留级的。

我们班同学现在能记起的有：何书绅（现名禾果，辽宁科技出版社编辑）、刘有（现名刘友，辽阳市教育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讲师）、李世邦（现四平师范学院副教授）、梁中璋、梁维民、李汉超、彭守身、沈德华、刘靖宇、张立民、孙靖寰、赵

长辛、罗洪章、刘铁骨等。

奴化教育种种

1. 思想控制。日本帝国主义的教育方针是为他们的侵略战争服务的。因之经常向学生灌输：“日满亲善”、“共存共荣”、“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王道乐土”等等思想。因为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一直这样，所以使许多中学生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只知道自己是“满洲国人”。我们这些大学生中只有个别人不知道，大多数是具有民族意识的。正因如此，学校对学生尤其对文科各班（系）学生控制非常严。在教学上从不讲中国历史，历史课只开满洲史（实际是东北地方史、满族史）和日本国史。对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民族英雄，更是只字不提。教师上课，对国内、国际时事，真正做到了“莫谈国政”的地步。我们二班（中文系），只讲“五经”、“四书”和清代文学，至于秦汉、隋唐、宋元的文学一概不讲。中国的现代文学更是禁区。要抓住哪个同学公开看鲁迅的作品，那就是“思想犯”，轻则坐牢，重则杀头。

2. 军训。伪满中学、大学一律实行军事训练，以备补充兵源，更主要的是灌输“武士道绝对服从的精神”。师大有军训教师，如酒井、小林（军衔是中尉）、大山（上士），他们利用军训之机，对学生进行残酷折腾，动不动叫学生双手举枪（学校备有一些破旧枪支，无子弹，供军训用），双腿弯曲蹲着，在运动场上来回跳跃，有的同学跳不动了，瘫倒在地上时，军训教官就上前踹几脚，重打几拳。卧伏地上瞄准时，教官在学生身上走来走去，用皮鞋踢几脚，踹几下，打耳光，用刺刀背砍，那是经常的事。有一次军训下课，在向枪库送枪时，我动作稍慢一些，大山就用刺刀背把我肩膀砍了一个大坑，十多天不敢

扭动。1943年冬天，我们到乌拉街做野外行军训练，沿途走了两天，第一天晚上住在大屯，第二天傍晚到了乌拉街村。沿途啃着由学校带的冻成冰块的饭，回校后，发现自己患了痔疮。

3. 盲目服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培养学生盲目服从，由中学开始就实行上级生可以随便打下级生的制度。我们师大也这样做，学生见教师要行举手礼，下级生在校外见上级生也要行举手礼。年级区别很严，有一次周日我到街里去，在半路上光顾走路，没见到上年级生体育系的于某，他把我叫住，先用日语，后用中国话把我申斥一顿，这件事是发生在我入学后不多天，因而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年级区别的标志是在制服领口的一侧有年级的数字标志，一年是Ⅰ字，二年是Ⅱ字，三年是Ⅲ字，因而一见就知道是几年级同学。

4. 参拜神社。1944年以后，每天早上全校集合到运动场上，先前是背诵“国民训”，以后改为背诵“军人五训”。其内容有“军人，应忠诚于天皇陛下……”然后到运动场西南角“神社”前行礼参拜，最后解散回宿舍洗脸、吃早饭。每逢重要节日，由学校集队出发，顺公路步行10多公里，到东关大神社前（现在儿童公园内）行一个礼，拍三下手掌，然后解散。也有时行一个礼后再集队走回学校。为了参拜神社，学校停课是经常的。有时为了“祝愿”前方将士“打胜仗”，或前方士兵战死很多的时候，都要走到东关神社去祈祷。因而同学背地说：“大老远走来，到‘鸡架’（日语神社的谐音）前贼蹒跚就拉倒了。”每来一次大家累得够受，还得以疲倦的身子走回学校。

5. 背诵诏书。每逢各种典礼仪式时，要先把诏书“毕恭毕敬”地宣读一遍（傀儡皇帝溥仪的诏书），真像对待古代皇帝圣旨那样，只差没有“三拜九叩”罢了，古代皇帝的圣旨只宣读一遍，而伪满诏书说不上要念几千遍，并且所有大、中、小学

学生都要背得“滚瓜烂熟”，我这六十多岁的人到现在还能背下些，可看出奴化教育的深刻。伪满开始头些年读的是所谓《即位诏书》（溥仪即傀儡皇帝位），溥仪称日本为“亲邦”，由这以后让我们称日本不是“友邦”，而是“亲邦”了。

6. 日语是“国语”。伪满时各级学校，连小学高年级都得上日语课，中学每周至少要上6~8节。大学许多科除用日语上课外，还得单上日语课4~6节。伪满规定“国语”（通用语言）是两种：一种“满语”（就是汉语）；另一种就是日语，师大入学考试，平时答卷，和教师讲话，课堂用语都得用日语。甚至不少学科中国教师给中国学生上课也得用日语讲。我们二班（中文系）学生没有一个是日本人或朝鲜族人，可是上普通教育学的杨志裕、上地理课的李永藩两位中国教师，上课时得用日语讲课，我们不明白或听不懂的地方，提出来时，他们再用汉语再讲一下。在校内外，和日本人及朝鲜族同学谈话都得用日语，即或他们会说汉语也不许用汉语讲话。学校督促汉族同学互相用日语谈话。军训、体育课的口令完全用日语。这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已强迫朝鲜族人民和台湾人民完全改成日本姓名，这样好使他们忘掉祖国。

7. 监视学生。学校设数名舍监，大多数是日本教师。各寮（宿舍）设寮长，全校（也即全舍）设学年代表，都由日本人或朝鲜族学生担任。他们负责监视学生的思想和行动。每晚自习都在寝室内上（每室4人，设有课桌和椅子），舍监常来查看。每晚就寝前，要在走廊内站队，排列整齐，点名报数。然后等待舍监和最高学年代表（舍长）来到后，寮长向他们报告在籍人数、出席人数、缺席人数、缺席者姓名、原因等。完全用日语报告。舍监走后，才能解散回室就寝。在白天上课时间，有时舍监到各寝室查看一下，看看是否有反满抗日的文字、书刊。

8. 逮捕学生。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军事上的失败，对东北人民的统治更加疯狂，以“经济犯”、“思想犯”之名义大批逮捕和屠杀人民。师大学生更是他们注意的重点。每到年末举行毕业典礼时，都要有几名同学“失踪”，实际是被日本宪兵队或特务机关逮捕走了。1943年年末的毕业典礼举行后，一位姓张的毕业同学，行李已经捆好放在宿舍内，可是一直到吃午饭后（毕业的会餐，要丰盛一些）仍不见踪影，同室的同学还不敢声张，只好暗中寻找。后来听说在毕业典礼结束后，这位姓张的同学刚一出正楼门，被两个人挟持到汽车上带走了。这是公开的逮捕。也有的同学说不上什么时候就“失踪”了，被逮捕的同学很少能够活着回来。据以后传闻，被捕的同学还有金宝环、王树森、李景超等人。

9. 勤劳奉仕队。伪满后期，把各大学学生编为“勤劳奉仕队”。“勤劳奉仕”就是义务劳动，又名“奉公队”。师大也是这样，学校有各种劳动，如：种菜、植树、搞环境卫生、修运动场等等。每年暑期还要到外地去劳动。

10. 防空演习。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搞防空演习是非常频繁的，甚至叫学生停课做演习。假空袭、假消防、假救护……有时一天演习好几次，也有时半夜起来演习。一次，美术教师池田因演习时开灯，被警察局拘留三天。拘留所内一些中国“犯人”，见池田没带行李（冬季），就主动给他棉衣、被子盖，吃饭时主动给他打饭。回来后他对同学们说：“在警察局拘留所内才是真正的‘日满亲善’。”

11. 国歌要唱日本国歌。每逢庆典或节日集会都要唱日本国国歌和伪满洲国国歌。日本国国歌名叫《君之代》，唱时都要唱日语原文。

学生生活

1. 服装。外衣和大衣、帽子由学校发给。外衣分正服和劳动服。正服就是制服，立领三个兜，是在节假日或集队外出时穿的。原高师时是好料子做成的，到了我入学后，就都是由纤维布做成的了。大衣是像麻袋似的粗糙呢子做成的军人大衣样式，帽子由四角帽改成“战斗帽”。帽上有师大珧琅校徽。劳动服在校内上课和劳动时穿，翻领、紧袖口。衣服、帽子一律是“国防色”（就是绿黄色）。听说高师时还发皮鞋，到了我们这时什么鞋也没有发。

2. 伙食。是公费，至于一个同学多少钱的伙食标准，我们从不知道，只知道学生科管理伙食。说学生伙食，不如说这是“舍粥场”。早晚是两顿苞米面做的稀糊糊，每人一碗（现在饭店装四两米饭那样的饭碗），午间是约二三两重的半个窝窝头。按月计算，每个人的粮食顶多不过10公斤。那时粮食不供给，多吃可以多买，可是学校为了省钱，特意少给饭吃。师大的饭厅在地下室，开饭时，铃一响就得赶快去，8个人坐在一个长条桌旁，去晚了分不到饭还要受责罚。等人到齐了，由学年代表或舍监发表通知或讲话，然后大家齐声说一句“我领受恩赐就要开吃了”，然后开始吃饭。吃饭时不许说话，更不许打闹，因饭少，三两口倒进肚内就起身回去。饭碗、筷子是自己的，用完自己带回，因为吃不饱，饭后就得到学校的小卖部或者冯家屯（出校门往西不远）去买煎饼。有的由家中拿点炒面，掺在苞米面糊糊里吞下肚去。我买不起白面做炒面，只好在家里把高粱米磨成细面，把它炒熟，买不到白糖（白糖是配给品），用盐面拌入炒面里拿到学校来（利用寒暑假回家时拿来），还不敢放到明显地方。如果寮长或舍监看到，立即没收扔掉。每逢周日同

学生们到街内去吃一顿煎饼豆腐脑，或者去吃上几碗高粱米面的
粽子（我一次可吃5大碗），这是最便宜的饭，也是我们最好的一次“享受”。

我入学后第一年，日系学生与满系（中国人——汉族、满族、蒙族、回族）学生同在食堂内吃饭，每月“满系”学生还可以吃到两三顿大米饭（量很少）。可是到了1944年，“日系”学生单坐一边，他们天天吃大米饭，而“满系”学生坐在另一边，天天吃苞米面糊糊或是窝窝头，一年到头也尝不到大米饭的滋味，这时在老百姓中发现吃大米饭就是“经济犯”，要治罪的。学校托辞说：“日系”学生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要入伍当兵去，所以让他们单吃大米饭。“满系”学生虽然不敢公然提出反对，但在吃饭时都不断向“日系”学生“怒目而视”，最后“日系”学生每到吃饭时把饭分了拿回宿舍去吃。

由于吃不饱，饥饿难忍，很多人就偷着点电炉子做点什么。如被学校发现，那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但学生们不管这些，他们在街上买个电炉丝，回校后拣块红砖，刻成炉盘式的沟道，电炉丝放在里边接上电线，就可成为电炉子。使用时在门口放哨，使完后用纸包上放在厚书的套皮内，以此来蒙骗舍监等人。

3. 住宿。全校学生都得住宿，4个人一室，上下两层硬木板床，上层2人，下层2人。室内有课桌、衣柜、书架，白天上课之余或晚上就寝前都可到寝室来自习。洗脸盆、用具都得放置整整齐齐。床上只供给一个草垫子，被褥等物都是自备。草垫子是多年陈旧的，其中不知藏多少臭虫、虱子，校方对此不管不问。只有一次学校大搞卫生，原因是学校发现二楼东侧有两三个寝室，几批进去住宿的学生，都患了猩红热病。日本人怕传染到他们身上，才对所有寝室进行了彻底清扫。

永远忘不了“勤劳奉仕”

1. 修国境公路。我入学第一学年暑期(1943年7月),是到东宁县境内(现黑龙江省东宁县)去修中苏边境的“军备国道”(国防公路)。我们7月初在学校做了两天准备,每个人都穿劳动服,拿一床毯子或薄被。学校每人发一件一尺左右宽的黄布,中间剪成四五个豁口,缝在战斗帽的后面,以防蚊蠓。每人带上洗脸用具、饭盒(日军用的“猪腰子”式的饭盒)等物。出发那天由学校集队步行到火车站。队伍不按班,而是重新编成大队、中队、小队,各队长都由日本学生或朝鲜学生担任,有正有副。我们的大队长由宫城、桥场两个高年级同学担任。带领我们这队的教师有柚木和酒井等人。我们中队长有伊藤和清川两人,小队长叫森田。到了车站看见路两旁排列不少穿蓝制服上衣(大翻领)和蓝裙子的女同学,一打听才知道是师大(校址在长春)女子部同学来欢送我们的,这些女同学一直把我们送上火车,车开动才退出车站。这一列火车完全是运我们用的,就像对待日本关东军军用列车那样,每当走到各车站都有“国防妇人会”(日本人的妇女会)的成员接待我们,给我们送水、送饭(当时有规定,军用列车走过的地方,都由各地供应饭食和饮水)。列车由吉林经蛟河、敦化、延吉奔图们,由图们北上奔牡丹江行至东宁县道河村(小车站),共走了4天3宿(列车不是按正点运行,而是串空行进)。在道河下了火车没有停留就奔向原始森林地带,也是中苏边境地带(再向前没有公路了,这公路刚修完不久,沙土很新鲜)。在公路尽头小河边砍树、拉绳、挖沟把由道河抬来的帐篷搭起来。第二天就天始干活。先伐树,后挖掘沙石,顺着山间小溪在山腰开辟出一条公路来。最累的活是挖树根、搬大石头,既不用机械,也不用炸

药，完全用人工来干，我们简直成了“劳工”。听说我们进山时路过的那段公路，就是从各地抓来的劳工修成的。我们进山后，沿公路两旁有不少日军帐篷，可能是些修桥梁的工兵和守卫边界的警备兵。我们工地不远就有日军驻扎，也许这是监视我们的。

我们每天早晨4点钟起床，之后开始劳动（天刚亮），7点回帐篷吃饭，半个小时后再接着干，午间休息1小时，包括吃午饭时间在内，晚上10点收工。各级队长不劳动，只是在旁边监督、指挥，谁干得稍慢一点，或干得不对，或集合稍迟一步就棍打脚踢。山间木棍遍地都是，队长们随时可操起木棍打来。我们小队长森田，一只眼睛有“玻璃花”，我们背地叫他瞎眼驴，这小子最能打人，他身高才1.4米多，打耳光够不着高个同学的脸，他站在高台上或树桩上，把同学叫到跟前打耳光。我们中队一个叫张凤久的同学，因搬不动大树，被中队长几木棍子打得大口吐鲜血。

我们住的是圆形的帐篷，潮湿的地上，铺上一层小树枝，上面再铺上一层草，草上铺上毯子。我们每天就睡在这冰凉而又潮湿的地上。因为每天太劳累，所以一躺下就睡着了，不等睡熟又得起床了。

山间蚊蠓又多又厉害。尤其一种眼睛刚能看见的小蚊子，我们叫它“小咬”。这种蚊子叮人后，身上一片片起包，奇痒难忍。我们虽然有紧袖衣服，系腰带，打绑腿，头上帽子下面用毛巾包起脖子、脸，但也挡不住小咬钻进来，在身上，在脸上叮成一片片大包。我们队有个姓高的同学，被蚊子叮得脸全肿了，随后溃烂一片。山间的“瞎蠓”（学名叫牛虻）又大又多，白天蚊子不断，它也出来逞凶，叮到脸上、手上，顺它咬的伤口不断向外滴血。早晨、傍晚时刻，小咬像烟雾一样，一团团扑来，简

直使你防不胜防。

劳动量大，劳动时间长，还吃不饱饭。每顿一小碗大米饭，菜是一点点咸菜或咸鱼干，这只能是我饭量的六分之一，再加沉重的劳动，饥饿的程度更加大。每天都处于饥饿状态中。饿急了，利用间休时间，到小河边去拣点日军扔掉的明太鱼鱼头、鱼尾，或采点野菜生吃。午休时间长点，就用饭盒子煮点野菜吃。有一次叫我们四五个人到道河村去取工具，一进村我们每人就买几块大豆腐饱餐一顿。临走时，我偷偷地买了一斤饼干（细苞米面加点糖烤制而成）拿回工地来。晚饭后到高帐篷稍远一点地方偷着吃，正吃着听到小河对面有人哼哼。我问是谁？对方有气无力地回答是李世邦（现四平师范学院副教授），因为饿得难受，他正在河边摸黑找吃的东西呢。我隔着河扔给他几块饼干，他狼吞虎咽地吃下去了。以后他常说，多亏你那几块饼干，不然那天非饿昏不可。

随着公路不断向前延伸，工地离帐篷约有五六百米远了。一天，天下小雨，小队长命令我回住处取丁字镐，我顶着雨回到住处，发现大队长和带队教师住的帐篷门口放着剩下的半桶饭。我看帐篷内无人，急忙盛了一大碗躲在帐篷后面，三口两口吃下肚去，几分钟就吃了4大碗。虽然饱了一天，可是第二天就闹开肚子，第三天开始便血了。开始不给假，当我说是痢疾，队长怕传染不但给假，还送我到日本军帐篷的医务所去“住院”，经诊断是急性肠炎，住了12天院才回到工地去。12天的疾病折磨，我已面黄肌瘦，浑身无力，队长看我实在干不了重活就叫我干一点轻活——平整路面。

一次，我们在路边休息，远处走来一队人，走近一看，约有一二百人，全是赤身裸体，有的在肩上，有的在腰间，用麻绳系着破棉衣裤，有的扛着铁镐，有的抬着破席子，后面有几

个背枪的日本兵押着，他们每个人的身上、脸上，布满滴脓滴血的痍疤。这是由于浑身一丝不挂，而被蚊蠓叮咬所致，也许由于久睡在用破席搭成的“帐篷”中潮湿地上而生的。其中有几个人被人架着走路。这是轻病号，若是重病号早被日本人打死或推到山崖下摔死了。大家都知道，这是各地抓来的劳工。

我们进山后，带队的教师告诉我们，在山里无论见着什么入，包括日本军人，决不许与之交谈。因此当这些劳工在我们不远的地方坐下来休息时，我们也不敢和他们谈话，只见他们有不少人拿出一个窝窝头，然后到路旁摘些榆树叶子，塞在窝头眼内，连榆树叶子和窝窝头一同放在嘴内吃了起来。由此也看出了那些劳工和我们一样，都是吃不饱。过去在家乡传闻抓去的劳工，如何受迫害，过着非人的生活，十有八九回不来等等。今天才真正见到。当公路修到山的最顶点时，和对面修路队伍碰上了头，大家欢呼“万岁”，因而给这个山顶起名叫“万岁岭”。有的同学偷偷爬上树尖，向东方观望，已看到了苏联境内的乡村房屋。此处距中苏边境至多不过二三里地远。后来听说当我们由“万岁岭”往回撤走时，有两名日本学生，朝苏联方向走去，被国境线上的部队抓了回来，盘问时，他们说：因便溺落在返校的队伍的后头以致迷失方向。结果怎样就不清楚了。后来有的同学暗中议论，那两名日本学生是特意奔向苏联去的。可惜没走过去。

2. 制造酒石酸石灰。第三学年暑期(1945年7月)开始，学校决定全校同学去做酒石酸石灰。先由博物系教师给我们讲解用途及制做方法。他们说，酒石酸是军用急需品，是制造雷达和潜水艇分解淡水用的必需品，当前“大东亚圣战”急需这种化学药品。我们做成酒石酸石灰，再运至别处精制成酒石酸。做法比较简单，就是用东北东部山区的山葡萄叶子，用大锅熬出

叶子水，再掺入石灰搅拌即成。

在校内学完制做方法后，我们就到磐石县城进行实地操作。最后，回到学校编队，分配到牡丹江省、吉林省、间岛省（今延边）、通化省的各县村，去指导制做酒石酸石灰。

我和20余名同学分配到敦化县，到了敦化又把我和一位一年级姓王的同学分配到额木村去。这时是7月下旬。收集葡萄叶子等工作全由各村“兴农组合”（即各地粮库）筹办。我们两个人到了额木村河西“兴农组合”报到，主任是朝鲜族，他不大会汉语，我们和他交谈都得用日语。这时农民被迫上山采集葡萄叶子，每户的任务量非常大。如果不及时交上，就要罚款、挨打、拘留。我们亲眼看到警察殴打交不上葡萄叶子的农民，警察、村长趁此机会又向农民大肆勒索。在第一批酒石酸石灰还没有完全制好时，8月8日，苏联已经对日宣战，苏联的飞机已在上空不断飞过，至此我们这个造酒石酸石灰的“工厂”也就解散了。8月15日，广播播送了天皇裕仁“无条件投降”的告臣民书。同学们跳了起来，欢呼祖国抗战胜利，欢呼东北光复。

（摘自《吉林市文史资料》第六辑）

“满铁”经营的奉天铁路学院

霍儒学

我是伪满时期“满铁”经营的铁路学院第七期毕业生。

“七·七”事变以前，该校正式名称是铁路学院，日本占北平以后，在北平又设立中央铁路学院（实质上也是满铁经营），

于是设在沈阳的便叫做奉天铁路学院。

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日本立即以“委托经营”把全东北铁路交给“满铁”经营。奉天铁路学院经过半年多时间的筹建，于1933年2月开学。“九·一八”以前东北学制为四、二、三、三、四，学年由暑假开始，“九·一八”当时学校停学。1932年春季起，按日本方式，学年由春季开始，奉天铁路学院第一、二期生，基本上以高中毕业生为主，同时也招考一部分原东北大学未毕业又未随东北军进关的学生及一部分高中在校生、少数初中生。入学考试科目为数学、物理，外语作参考，不考化学（因和铁路业务关系不大），但体检严格。学校设在原东北大学工厂地址，又另建教学楼、宿舍、实验室、工场。在当时沈阳的三所大学（另外两所即南满医大、奉天农大）中占地面积最大。本科三年制，每期300人。这是“满铁”在东北设立的第三所高等院校（另外两所是南满医大、旅顺工大）。奉天铁路学院完全由“满铁”领导，与伪满洲国没有任何关系。它是伪满洲国成立后，最早开学的一所学校，是日本通过“满铁”推行大陆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筹建之早，开课之快，非伪满其他大学所能比。人事安排，也不一般。初任院长为小林铁太郎，“七·七”事变后，到北平任中央铁路学院院长。继任院长为张恕，原张作霖的参谋长，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学院日常业务由副院长担当。我在校期间副院长为朝日直树，留美学生，与当时“满铁”总裁松冈洋右比较熟悉。

奉天铁路学院完全是日本式的。它根本不用伪满年号，满洲国假日不放假，寒假暑假很短（寒假包括春节在内只一周多），伪满政府规定的大学必修课，如建国精神等科目，也一概不设，从不唱伪满国歌，不升伪满国旗，不悬挂溥仪像，也不向伪帝官遥拜，伪满建国10周年时各伪满大学都大肆庆祝，该

校视若罔闻。在思想教育、学科教育方面，也有自己的一套。

思想教育的中心是向学生灌输崇拜日本、绝对服从、不怕艰险的精神。学院并不设政治课，但在日常教学中、生活管理中随时进行思想工作。如：

早操。每天上课前有早操，全校按年级班级站成纵队，面向指挥台，各班由班长向军体教官报告人数；此时全体教师，必须在指挥台两侧面对学生排队、横站一列或两列，由军体教官，向副院长报告出席的教师数、学生数；随后一声令下，全体面向东京，遥拜日本天皇；接着由副院长训话。

读日本报纸。由二年生开始，每个学生每天发一份《朝日新闻》（学生版），上日语课时，由教师提问并记分。

参观。按教学计划参观鞍钢、抚顺煤矿（都由满铁经营）。这是必修课，参观后每个学生还要写观后感。有时也参观沈阳铁西的某些工厂，以显示日本的工业技术。

耐热训练一个多月。在大连海滨，进行野营训练谓之耐热训练。训练期间，早晚由副院长、教官讲日本精神、日本事情、世界形势，中午海水浴、登山或长途行军，到大连或旅顺参观日俄战迹，请日本军人讲“二〇三高地”之战和乃木大将的事迹。还参观大连码头、资源馆。此时正是伪满各大学校放暑假。耐热训练结束后，才放暑假一周。训练期间任课教师也参加。

毕业前到日本旅行两个月。去时由大连乘船，回时经由朝鲜。伪满大学也去日本旅行，但参观内容常不一样。奉天铁路学院学生参观由满铁东京支社安排，常得到日方特殊照顾，如一般学校不容易去的地方，也能参观，像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陆大、海军兵学校等。其目的是使学生知道日军训练严格、官兵素质高，战则必胜，而铁路业务是半军事性质，一旦有事，应像军队一样能胜任。参观军工厂、军舰，也是同样目的。

“满铁”总裁来学院视察检阅。每年一次，总裁由“满铁”上层官员陪同。先检阅分列式，再抽查一二个班上课情况（每次抽查必有日语课，有时总裁亲自与学生问答），最后集合在大礼堂训话。我在校期间松冈洋右曾来视察一次。

总之，思想教育，也就是奴化教育，无孔不入。

学科教育。本科分前期、后期，各为6个班，前期分为一、二、三、四、五、六班，同样都学日语、数学、物理、体育4科，日语每日3~4节，不用课本，不管入学前学了多少（有些学生入学前已有三等水平）一律由听、说开始，日语教师，都是专门受过训练的，标准音、纯洁日语。前几期的日语系主任是山口喜一郎，此人是日本对外国人进行日语教育的权威，最近日本出版的《大百科全书》记述了此人，他首创一套独特教学法，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军曾采用过，效果较好。1933年以后伪满的一些大学，先后到铁路学院参观日语教学情况。伪汪精卫政权的一些大学也远道而来参观日语教学。现在日本国内的一些留学生预备校，也沿用此法，不同的是广泛应用了电化设备。1938年以后山口本人到北平去对中国人进行日语教育。

后期分成5种专业，仍是6个班。一、二班学铁路管理；三班学机车的制造、检查、修理、使用；四班学机车以外的各种车辆的制造、检查、使用；五班学建筑；六班学电气。一、二班也学一些机车概论。车辆概论，主要是知道它们的性能，更多的是铁路经营理论和法规、统计学，法规全用日语文言文记述。三、四、五、六班统称为技术科。技术科理论课、基础实习在本校，操作实习在奉天市（沈阳）各大机务段、车务段、工务段、电务段和铁路工厂进行，这些段、工厂的领导多半兼学院的技术课。一、二班在毕业前，到较大车站实习一个月到二个月。现场领导与教学人员经常互相交流，教学与实习结合得

很好，一般地说，调到学院的都是优秀的现场人员，并能得到晋升，待遇也好，还有到日本见习的机会。

学院始终重视日语。分配工作时，首先考虑日语水平。往沈阳、长春、哈尔滨、锦州、吉林、齐齐哈尔各大中心去的必须日语好，其次是体格好。因此，“满铁”每年都进行语学检定考试，对中国人考日语，对日本人考汉语、俄语。合格者按等级每月在工薪外另加语学津贴。学院学生每年必须参加语学考试。此外每年还进行体力检定。类似我们现行的达标测验。日语不及格、体力检定不及格的一般退学。

生活管理。一句话，日本式半军事化。如：人事、经费、教育计划都由“满铁”领导机关负担和审订。

每名学生供给校服（满铁中级——站长级——职工制服），实习服、食费（相当于解放初1949年沈阳市供给制中灶标准）、一切实习用书（包括上述《朝日新闻》），另外每月还发津贴。因此，只要星期日不在校外大吃大喝，每月都稍有余钱。

全部住宿。平日不准出校门一步，周日早饭后可外出，晚自习前必须回校。先由舍监点名，漏者受罚。每个年级同住一栋宿舍，宿舍分室，室有室长，每晚就寝前，由寮长（每个年级的一个宿舍都称为寮）陪同舍监点名（有时由三年级寮长代理）。晚自习在寝室内进行，因此上课前，下课后教学楼封闭。学生下课后也没有时间看其他书，技术各科忙于作数学题、物理题、制图；管理科日语课比技术科多，文言文法规有些需要背诵。因此虽然有图书馆，但没有人借阅。何况，就寝时间一到一律熄灯，起床前，不得私自活动。

伙食标准高。因为军体训练严格，所以伙食标准高于一般大学。如长途行军，徒步跑到北陵上体育课，每年一次绕北陵一周马拉松比赛，一次围剿野兔作战，一个多月耐热训练。平

日实习的体力消耗也很大，如向机车内投煤、大检修、土木工程实习的野外测量、搬运枕木等，这些训练使学生体格强于一般大学生。但住的条件不如一般大学，这是因为筹建时间只有半年多，更因为培养计划有一项是学生能耐劳，由于铁路业务比较苦，需要在学院养成适应不太舒适的环境。这在校训中有一条规定，叫“质实刚健”。

绝对服从。一、二年生在外出途中遇三年生必须举手敬礼。因为都穿校服，领章上有一、二、三年级的标识，又有学号（铜质阿拉伯数字），一看就知道是哪个年级、哪个班的学生，如不敬礼，上级生可当时训斥，甚至回校后叫到宿舍或舍监室训斥。头几期学生，假日外出去市内购物时，和其他校学生口角过，一人与他人人口角，凡路遇的学院学生必须上前助阵，因此打过群仗，因体格好，常占优势，故市内一些学校称学院学生为“铁驴子”。肇事后由上级生向校领导，主要向舍监或军事教官如实报告，就没有事了。

通过这样的思想教育、生活管理，铁路学院确实为“满铁”培养出一批铁路骨干职工；这是“满铁”推行大陆政策的一部分。优秀的毕业生有的遇到日本留学、见习，有的调到华北、华中的铁路院校任教。当时学校最高兴的是专修科（电报科）的一个毕业生的事迹。诺门罕事件时，苏军飞机大炸阿尔山火车、车站、铁路，使日伪军供给中断，当时阿尔山站长大石和这位铁路学院毕业的报务员，冒着生命危险死守电报机，及时发送了大量军事电报、铁路电报。事后受到上级嘉奖，站长大石被调到学院任三年级一班班主任，向全校介绍这位毕业生事迹。学院副院长常在全校大会上以此为题训话。“满铁”首脑也比较满意。铁路学院的工作也受到上级表扬。自1940年冬起，从来没有配过中国人的重要岗位也开始派学院毕业生了，如奉

天（沈阳）站售票室、货物处、奉天（沈阳）车务段、奉天到大连间的列车长也有中国人担当，我自己也是第一个给日本学生上课的中国人讲师，登上了铁路教习所（进修学校）的讲台。

日本人哪里知道，就在他们满意学院毕业生的表现之时，1941年12月30日全东北一齐搜捕的地下国民党员、北宁路党部关外段小组成员有3人是学院六、七期毕业生。1945年8月15日，有40年历史的“满铁”自消自灭了，奉天铁路学院也只剩下一些废墟。

（摘自《长春文史资料》第十二辑）

伪满法学校

姚洪山

这个学校是“满洲国”司法部于康德元年（1934年）成立的。1938年改名为“政法大学”，是当时伪满政府所建立的几所特殊的高等学府之一。校址在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南岭的“大同学院”的毗邻，是现代化的二层楼房，食堂、便所、盥漱室等都在室内。室外有一规模不大的运动场，设有网球、篮球。大学校东邻半里左右的地方，有从南岭通往新京车站的公共汽车站，到市内各马路游玩，可免徒步之苦，交通较为便利。

这个学校设立的目的，是专为巩固殖民统治培养维护侵略法权的司法人才，即未来的司法官（法院的审判官或检察厅的检察官）。共招生5期，每期为60名，春季始业。报考资格限于国高或同等学历的满系（满洲国人）男子，修业年限为3年，待遇是毕业后即任命为学习法官（委任一级），月俸100元，后改

为高等官试补，月俸为150元。在地方法院和检察厅学习一年后，参加高等官合格考试，合格后任命为候补法官（审判官、检察官），月俸为180元，较其他同等学校，在毕业后的待遇是高的。在学期间的待遇也比较优厚，是全官费，每月17元，服装寝具是借用，冬季呢料西服两套，毛毯两条，外衣、手套、棉鞋应有尽有。因为待遇高，毕业后又能做官，所以报考的是大有人在。录取名额很少，以致十有八九是要落第的。也有屡试不第的。康德元、2年，又招两期2年毕业的班级，计120名。把两年毕业的称为乙班，三年毕业的称为甲班。

学习课程：组织法（代替宪法），中国法制史、民法、刑法、商法、刑事訴訟法、行政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经济学、英语、日语、体育。

课程担当者：组织法和行政法由藤崎朋清教授担任，法制史和伦理学由泷川政次郎教授（法学博士）担任，民法由西村义太郎教授担任，刑法由讲师司法部属官尾坂俊夫和副教授岩崎二郎分别担任，商法由讲师司法部理事官宇都宫担任，民事诉讼法由讲师新京地方法院次长森哲三、审判官米内担任，刑事訴訟法由程光明教授担任，国际公法由副教授林保太担任，国际私法由陈明德副教授担任，经济学由中根布属雄教授担任，英语由讲师外交部属官丁文蔚担任，日语由翻译官石川、高木等人担任，翻译由石川、高木、康成九、黄滨淮等人担任，体育由日本在乡军人（退伍军人）神宫司大佐担任。日文讲课时起初翻译后来直接听讲，课后阅读日、满文对照的讲义，没有课本，只有参考书，英文有课本名为“The lure of japan”（日本的魔力），日文课本为“日语读本”，体育为一般体操和日本剑术（木剑）。

配合学习的参考书籍，有自备的日本、中国的法律参考书，

但主要是图书馆的原文（日文）参考书，作者都是日本法学界名流、学者、博士等权威人士。如刑法权威者牧野博士和泉二新熊博士（日本大审院长），民法权威者我妻荣博士等人所著的刑法总论、分论和民法总法，鸠山香夫的债权法等。

学习总的情况是终日埋头书案，国家大事，不闻不问，民族仇恨，十分淡薄，思想封锁很严。所以即或有志之士想看一点进步书籍，也只能是望洋兴叹罢了。

在组织法内规定有：危害皇室罪和大不敬罪，就是凡有危害满洲帝国皇室或对皇帝有侮辱不敬行为者处罚。

在法院组织法中规定：法院审判官在审理刑事案件时，关于条文的适用，刑之量定等有独立权限，他人不得干涉。实际上这是一纸空文，审判官在处理某一案件最后判决时，都必须经由省长（厅长或次长）的裁决和同意后，始得宣判，这叫什么裁判独立？

至于检察厅的检察官则不适用裁判独立的原则，而是适用检察一体的原则。事无巨细大小，在搜查、讯问、起诉与不起诉等问题上，都必须根据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向上级首长（厅长、次长）请示，经批准后，才得处理。这种规定，是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对占领国绝对驯服的具体表现。

此外又规定：自从涉外法权——日本的领事裁判权撤废（康德4年）后，满洲国的司法机关，有独立审判“涉外事件”权力。可一旦受理这类案件时，“满系法官”不能处理，只有“日系法官”才能处理，这与治外法权撤废以前又有什么两样呢？

综上所述，从所学的课程内容、精神实质、教育目的和教育方法一系列的问题来看，不难理解，完全是侵略者对被侵略者一种奴化教育的具体表现。

在每期学生即将毕业前夕，照例去日本旅行，游览名山胜

水，参观司法机构、工厂、博物馆、军港、商港……通过这些活动，使学生更便于接受侵略者的文化，从思想上来麻痹和征服民族意识，培养崇日亲日的情感，借以加强所谓日满亲善的关系，毕业后更好地为傀儡政府即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

当时学校的组织成员情况如下：

校长1人（先由司法部长左田正一担任、继由最高法院次长汲川德男兼任，再后来最高法院审判官筒井雪郎担任）、主事1人（由西村义太郎担任）、学监1人（由前日本陆军大佐神官司担任）、舍监1人（先后由河田等人担任）、事务官1人（由丸山担任），打字员、教授、译官若干人。

（一）学生的来源

甲班的学员绝大多数是来自于下级学校即普通高中、师范学校，少数是来自于同等学历的专业学校，部分是来自于其他高等学校或中小学校教员以及机关的在职公务员（职员）。乙班的学生百分之百都是在职的工作人员。不论甲班还是乙班，所有学员都是经过考试录取的，考试的方法是先笔试后口试，同时进行体格检查，三者合格之后方能录取。笔试科目有数学（包括几何、代数）、国文（作文）和日语三科。试题比较难，因此有屡试不第的，也有经过两次甚至三次应试才考中的。笔试的试场是分布于哈尔滨、新京（长春）和奉天（沈阳）三个大城市，应试的人数少则数百，多则上千，而入线名额为100。笔试及格者，然后集中到长春法校进行口试，口试科目和范围是极其广泛的，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有些问题的性质是反动的，如问“俾斯麦、墨索里尼是什么样的人物，有什么事迹？”考试官和翻译官威风凛凛地坐于堂上分别向应试者发问，应试学生须立即回答。口试毕，马上进行身体检查，合格后用书面发榜通知。口试时要从笔试考中的人数中淘汰掉40名，最后录

取60名，取得入学资格。所有应试的旅费和食宿费等完全是应试学生自备，所以家境贫寒的学生参加这样的考试是相当困难的。

应试人数之多，录取名额之少，正是由于该校的在学期间每月津贴17元，毕业后月俸百元以上。从这一问题来看，也不难看出日本侵略者的险恶用心。

（二）学校生活

所有学员都过着集体生活，全部住校，在学校食宿。星期六晚上可以外泊（外宿），但必须办理外泊手续。校医深町是日本医学博士，兼该校法医学讲师，每周讲课一次，传授法医学知识。例如自伤、他伤、自杀、他杀或窒息死亡等现象的特征，以及有关指纹学等方面的知识。文娱活动方面，开展的很不好，表现沉闷。该校的文体活动比起当时的高师、工大、医大等同级学校是大为逊色的。学校首长即不重视，学员大部分也不好活动，有时间多半是穿着西服革履在校内外散步，游逛或坐在一起说说笑笑，去公园、看电影，不然就是埋头书案，死啃书本，背教条，这种情况是司空见惯的，当然这也是办学者所希望的。

法学校作为精神食粮的课外读物极端贫乏。没有阅览室，只有一个规模不大的图书馆，里边的藏书倒不少，并且精装的很多，有中文本、日文本。但都是中外古今的法律和经济书籍以及有关的参考书类。学校准备的刊物报纸，只有一般的报纸《中央公论》（日文）和《中央公报》几份，其余是一无所有。学员必须订阅的杂志刊物，有法曹杂志和最高法院判例，每月一本。前者是司法部刊出的，内容材料都是由部里各级负责人员提供的。全是有关司法的问题。后者是伪满最高法院刊发的民事或刑事方面的判决例，是弥补当时法律（六法全书）之不足

的一种特殊条文，对下级法院有拘束力，对学员来说是应该知道的。从表面上看，法学校似乎是一个自由的天地，正是因为当局对这所学校早已实行思想封锁了，切断进步书籍的来源，学员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和条件又很少，再加上较优厚的物质待遇和毕业后的发展前途，就很容易消磨学员们的民族意志，而陶醉于物质名利之中了。这不能不说明日伪统治阶级统治手腕之高超。

（三）学员的思想动态及表现

如上所述，学员们的思想情况是比较平静的，但也不能说学员们心甘情愿的做亡国奴。兹将这样的事例略述如下：

1. 罢食

事情发生的原因是学生的伙食是由日本人饭村所成立的饭村食堂部来包办的。这个食堂部包伙的单位很多，凡是司法部及其所属机关和学校统由该部包办，外有其他几个部门也是由它来包伙。饭村极尽剥削克扣之能事，伙食管理人员和炊事员、厨师等人都很跋扈，态度很蛮横，有时甚至出言不逊。伙食费每人每月竟达八九元之多，根据当时的物价情况来看，所包的伙食，每人每月四五元左右就够了，计算起来，每人每月要被剥削四元左右。康德4年（1937年）的夏天正式发生了罢食运动，参加的学员是甲班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和乙班第二期共4个班，全体240余人，一致行动起来。直到第三天头上，才得到了令人满意的答复，食堂部和学校当局由让步到强硬，由强硬到屈服，终于答应了辞退饭村食堂部的包伙，由学员自行办理。

这次罢食的结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获得了胜利。

2. 从“西安事变”来看学员的思想动态

康德3年（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轰动全国的“双十

二”事件，当时伪《满洲新闻》报纸上第一版以头号大字排版，标题为《国共又告分裂》。在无线电里也大肆广播。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的各级统治者，法学校所有校长、主事、学监和日系教授、助教、讲师、翻译、职员及其他勤杂人员都喜形于色，欢欣若狂。

后来西安事变并没有按照日本帝国主义所期待的进程发展下去，而是和平解决了，此刻该校所有日系工作人员大失所望。表情上不像以前那样幸灾乐祸的高兴了。但是恰恰相反，学生的心情却与以前大不相同了。转忧为喜，感到事件没有扩大，蒋介石被护送回南京，真是不幸中之大幸，中国不致于亡，东北的收复是还有希望的。这又一次说明了当时该校学生的爱国的进步的思想及其表现。

（四）灌输奴化思想

当张鼓峰事件发生之后，学校的学监兼教授日人神宫司（前日本陆军大佐，当时是在乡军人）召集全校各班学生，在室外空地集合，进行训话。他当时神色慌张、大发雷霆、出言粗暴，颠倒是非地说：“诸君，你们知道吗？现在一个不幸的事件从天上掉下来了，就是现在突然发生的张鼓峰事件。我军在该地正式执行职务，一贯是忠于皇室，对邻国也一向讲求信义的，多年以来，日苏边防军从未发生任何不应有的军事冲突。此次苏军无理向我军挑衅进犯，纯系一种背信弃义的侵略行为，造成我军的伤亡事故，实属遗憾，苏联简直是看我软弱可欺，企图占领我满洲北部领土，扰乱国境治安，这种行为是令人不能容忍的。大家要认清时局，随时准备行动。苏军如再胆敢进犯，必将给予严重的惩罚和打击。大家要知道，我军有足够力量打退苏军一切进犯的，要有必胜信念。”就这样的向学生灌输反苏亲日的反动思想，并训练养成复仇和好战的心理以及军国主义

精神。

在课程的学习方面，千方百计地鼓励和提倡学日语说日本话，其目的不外更便于传授和灌输奴化教育，使东北的人民逐渐忘掉祖国的文字和语言，模糊民族意识，从思想上精神上奴役中国人民，除加强学习日语课，增加自习钟点外，训练直接阅读日文讲义、日文法律参考书，直接用日语对话。在图书馆的藏书中，绝大部分是日文版，中文版书籍寥寥无几，培养和鼓励用日文写作的能力，例如在平时和期末的考试中，希望尽量用日文答卷。同样答案内容，日文答卷就能多得分数。以此促使学生用日文答卷。

(五) 日本见学（旅行参观）

甲、乙各班历届毕业生，在临毕业那年的春季或秋季，照例的要到日本旅行。所有旅费、食宿费、观光费等都由公家报销。旅行时间约在三周左右。旅行的主要目的，为的是显示日本的国威，夸耀日本的强盛和物质文明的进步。通过参观，使学生在思想深处更好地树立起崇日和亲日的感情。出发前先由校长甚至司法大臣进行一次讲话，阐明旅行的目的和政府的关怀，并作了关于旅行参观应注意的事项的具体指示。然后由日系教官、舍监或教授领队前往。从伪都新京（长春）出发乘火车经由朝鲜、再从釜山乘船直达下关。以后便先后在九州、四国、本州等工商业、科学文化发达之名城和名胜的风景区以及装备先进的军港进行参观。最后由神户乘船渡海到大连直接返校。返校后还要把参观的心得和观后感向未参观班级的全体同学报告传达，使他们积极向往。这里应该提到的一点是横须贺军事要塞本应保密，为什么能开放允许参观呢？主要是要借此炫耀其军威，同时看一些表面现象也无关紧要。另外在该军港口岸观看了陈列的日俄战绩——在旅顺口打捞上来的曾被俄军

击沉的“三笠舰”残骸。舰上有当年东乡元帅所坐的座位，舰板周围还有无数的枪眼，东乡就在这个舰上战死的。通过这个可以使学生在思想上认识到东乡元帅的与舰共存亡、为国捐躯的日本军人的品质和特点，以及所换来的重大代价，从而效仿所谓日本大和魂的武士道的精神。

（六）抽调现职法官学习

1. 定期住校学习

伪司法当局为进一步培养一批得力的现职法官，于康德3年上学期，在该校开办了人数不多的现职法官学习班。从长春、吉林、哈尔滨、沈阳、营口等大都市的高等、地方和区各级法院、检察厅抽调庭长、审判官、检察官20余人，集中在该校食宿，进行为时半年左右的学习。与该校学员在一起生活，分班学习。主要是自修学习，配合教授和讲师讲课，专门学习法律科学，以提高业务知识和办案能力。

2. 分批分期抽调讲习

康德3年（1936年）7月1日，伪满洲国的法律公布实施了。新法和旧中国的法律内容和精神有很大变化。为顺利地贯彻新的法制精神，司法当局特在该校开办刑事法和民事法讲习班，为期3个月。先后办了二三期，人数较多。学员是由伪满各地基层法院、检察院抽调的现职法官，不住校，走读听课，由司法部高等官、最高、高等或地方法院的司法官担当讲师。课程内容主要是讲解新法条文内容和它的优越性，以便领会新法刑法的精神实质及其解释，回到本机关认真的正确的去运用和执行。

上述两种情况，都是为更好的训练现职司法人员，使之成为统治阶级得心应手的工具，做伪满统治者的支柱，巩固伪国家的社会治安，这就是日伪政府创办法学校的真正目的。

奉天农业大学的创设

(日) 宇田一 青玉芹 译

大同2年，我应满洲国政府总务长官远藤柳作之邀来到满洲国。当时很多朋友都反对我离开研究室和学会，而我却凭着一股热情毅然决定应邀前往。由于当时确是怀着为满洲而死也在所不惜的心情，所以是举家赴任的。

到任后，首先拜会了政府要人。满人的高官们也在商定时间后一一面访。时至今日，我仍然为中国人的礼数周到而深受感动。当时来访的每个人都要说一些“大家认为先生是真正为了满洲的开发建设而来的，万分高兴”之类的奉承话。理由极其简单，据说是一般的日本人，只是带着一只旅行箱单身赴任，而我却偕带家属，甚至连家具都搬来了。由上述原因，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感到不虚此行。

其后，总务长官先后由大达、星野、武部三人担任，他们都是我高等学校以来的朋友，彼此间意气相投，工作很顺利，日子过得也愉快。

言归正传，远藤君对我说，满洲国的基础日趋巩固，准备开始成立大学，并要求我筹建农业大学。

我们谈到投机处，最后，我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满洲国的大学必须改变日本大学的办学方法。虽然是具体的名称问题，我认为不应是农科大学，而必须是农业大学。如果办农科大学，真可能会像日本那样，重视理论，脱离实际，满洲的农业大学学习理论应该是第二位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对实际有

用的有能力的指导人才，而且，我甚至认为农业的指导者，掌握农民的心理是首要的，所以不能招收日本学生，只收满人青年。曾几何时，我竟同满洲融为一体了。于是，以创建只招收满人学生的农业大学和完全由我组建教师队伍为条件，我接受建校任务。

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确定大学的校址。虽有几处候补用地，但听说甲地是由满铁进入政府的人们提出的，乙地是从日本国内进入政府的人们、即文教部次长西山等人提出的。我认为，为了满洲国的发展，如果产生丑恶的派系之争，将出现不良的后果，因此，我另外物色用地，最后，决定在奉天市外塔湾的山冈上建设。

这里曾经是日俄战争时，乃木第三军艰苦战斗的古战场。在那里，有巍然屹立的舍利塔俯瞰奉天市街。

登上山冈，远眺南方，可望到抚顺，辽河一如往昔悠悠地闪烁在阳光下。北方则是一望千里连绵不断的平原，高粱已丰收在望。这块丘陵地正是作为教育场所的绝好地方。

正当我决心已定时，出现了反对的意见，有人说：“在这样的高地上，能引水上山吗？”按道理我应该清楚地知道农业和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这确实是我的疏忽。

我去关东州厅，走访了以“水神”而知名的清水本之助君，请他到现场查看土地。他说：“长着很多柳树，看来没有担心水的必要，但如果榆树多了，首先必须考虑会不会出水。”他的声音至今犹在身边。

塔湾的山冈是榆树少而柳树多的丘陵。为了找到水，于是立即委托清水君动手掘井。据说，怕是要挖四五十米才能出水，不料挖到26米时，清澈的地下水便滚滚涌出，实在值得庆幸，是清水使我得救了。

用马达抽起地下水，可以满足校舍、畜舍、农场的需要，还可以为附近的农家提供生活用水。以后的校舍和宿舍的修建同挖井相比就轻松多了。转瞬之间，学校的外观已初具规模。由于全部实行住宿制，所以每年都增建宿舍。此外，畜舍、青饲料储藏室和苗圃等也都陆续建成。

我创建三重高等农林学校（现在的三重大学）的经验，在这里发挥了作用。同时，三重高农的中野教授和我在三重时的学生古君、高木君等，放弃在日本的重要位置，前来同我一起工作，使事业得以顺利开展。

后来，为了不使教师队伍形成“三重派”，决定委托内地各大学及专科学校，推荐适当的人选送来任教。因此，有幸集中了许多优秀的人才，使我不胜感激。

三四年以后，每年都有大批日本国内的大学教师前来考察，并给予了高度评价。我也为自身价值的体现而感到自豪。那时，桥本两位博士曾赞扬说：“原以为虽名为大学，实际上恐怕还不如国内的专科学校，但身临其境看过后，发现竟然如此出色。”我立即答道：“学校之所以有今天，全是由于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

接着，根据中野教授的意见，在大学里，除农科外，又增设了兽医、畜产科，当时，有人认为应该设畜产科；也有人主张设畜产兽医科，而中野则认为在满洲没有兽医便不存在畜产。

同时，我按原定计划，这两个学科都只收满人学生，在教育内容方面日语和实习课占全部课程的大半。

因为当时在满洲只有这一所大学，许多大臣和简任官的子弟都前来入学。郑国务总理等也曾特意来为学生说情：“此人日语虽不甚好，请务必准许入学。”虽然我听说有权势人家的子弟往往认为干农活和饲养家畜是低贱的事。但是前来入学的青年

们，却能遵循大学的办学方针，很好的劳动和学习。

不久，文教部提出了希望允许日本学生入学的要求，然而，我坚持原来的意见，未改初衷。对此，也有人解释说可能是由于日本学生和满洲学生在学历上相差悬殊的缘故，而我并不这样认为。我担心的是如果在那些守纪律、讲礼貌的满人学生中混入日本学生，他们那些“永不整理床铺”，“边走路边行礼”的散漫作风，有可能使宿舍的纪律和文明行为遭到破坏。

不过，最后迫于为建筑和林业方面培养技术人才的需要，增设了农业土木科和林科，这两科只收日本人学生。于是，大连、奉天的名牌学校自不待言，新京、抚顺、安东等地的中学毕业生也都纷纷前来就学。学生课长对这些日本学生认真指导，严格要求，以便使他们成为满人学生的模范。幸而他们都能领会大学的方针，不仅使我最初的担心为杞人之忧，而且结出了民族协和之果。

然而，当学校开始进行军事训练，并逐步强化时，战争已步步走向失败。很多青年教职员和日籍学生们入伍战死或病死，令人无限惋惜，在此，让我衷心地祈祷他们的冥福。

以后，决定在哈尔滨也设立大学，我曾为选定建筑用地而奔走。还曾参与筹建奉天医科大学、奉天工业大学，并兼任过医大和工大的校长。虽然工作繁忙，几无宁日，但愉快的心情战胜了一切疲劳。

其次，在以牧教授为首的林科教师的努力下，在被认为不生长樱花的奉天，栽种了漂亮的樱花林荫树，到了春天，成为奉天人赏花的名胜。在以松野教授为首的农科教师的努力下，秋天为奉天人举行挖甘薯会餐。诸如此类，愉快的往事数不胜数。

（作者系原奉天农业大学校长，现为明治大学农学部教授）